



2010年10月30日19期

总第六十一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徐海亮 感谢与企望——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点滴感受](#)

[何蜀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点意见](#)

史林一叶

[范世涛 红卫兵抓走彭真——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

[阎长贵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乱世民情

[漂木 沈邱“锻炼”琐记——田园生活与“反标”事件](#)

[蒋健 那天，我们没有哭](#)

[黄晓龙 那天，我们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干杯——1976年9月9日的庆贺晚宴](#)

文革文化研究

[徐贲 文革中的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小资料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逸敏谈钟青谷的来信](#)

【国史笔谈】

[感谢与企盼](#)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点滴感受](#)

徐海亮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多年的辛勤劳作终于结出了硕果，他们的这部巨著为中国当代史研究，为世界了解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还要特别感谢迈克，还在中文版的翻译过程中，他就送给了我英文版。

这里仅仅谈点个人感受。老“麦克”和小“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继老“麦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与《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后的又一力作（尽管老“麦克”非后者的唯一撰稿者）。《起源》以详尽的历史事实和文献作铺垫，客观地记述和评论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史”。“前史”披露且激活了“文革史”爆发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深层动因与种种线索，我在文革前的亲身感受告诉我，这正是把中国的党政军干部——还有广大群众深深卷入文革巨澜的主要原因。

198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在推出《起源》时候，称它是一部“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我认为，这个评价仍然适合于今天的《最后的革命》。

我期待这部巨著已经很久很久。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努力，“麦克”和“迈克”终于把十年纷乱、繁杂与庞杂、波澜起伏，非常戏剧化的中国政治历史，较为成功地梳理和归纳在一本书里，这是很不容易的。在目前我所见到的文革通史中，此书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一部著作。我认为，无论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学者，还是官方的创作集体或个人，要在文革的专题史、地区史和阶段历史的研究尚未奠基之前，在大部分文献档案尚未公开之前来做这个事情，也还是比较艰难的。况且历史本身还有些重大事件与人物，尚未完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还处于疑案、政治专案和有争议的问题阶段。但我们的海外朋友把握住了历史过程的大脉络，身在庐山之外，记述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这场最后的革命。

作者在收集、涉猎基础资料方面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从正文文字和参考文献、注释中，可以看出作者尽可能地阅读了当年的文献，后来的论文与专著，以至搜集了民间散存的记述，专案材料和当事人口述。即使有着比他们更便利条件的中国学者，也不能不在他们蜜蜂般的辛勤劳作面前感到佩服和惭愧。特别是迈克发挥了他的特长和优势，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如干部、群众的言语、心态，或当时的某些社会图景，这使得该书增加了一些欧美社会学和心态历史方法的色

彩，而这正是国内文革研究所缺乏的。

不过，作者的机敏才智免不了挂万漏一。如说一个战士送文件，加上了九华山的定语，其实他仅仅来回于逸仙桥与九华山边的玄武湖畔。我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要专挑这类小毛病并不是难事，在一些史料来源、作者取舍和事实的评价上，中国学者肯定可以找到比这更大的失误。但是，这样做，难免有苛求外国学者之嫌。就整体而言，这本书的引注、文献、参考等是相当广泛而极有价值的。

从老麦克的风格来看，我略有些想法：是否由于《起源》的出版，影响了我们对“最后的革命”的期待，以至于觉得在《起源》中业已撒开的巨网在《最后的革命》中未达到理想的收拢？或者有一些重要的专题并未如愿展开？虽然作为给海外人士介绍文革的通俗性教科书，此书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作为读了《起源》再读《最后的革命》的中国读者则会觉得意犹未尽。

此书以高度的归纳和简练的笔触告诉我们，历史“有什么”，而我们似乎更想知道这个历史“是什么”。中国人还没有条件如两位作者一样秉笔直书，因此，我们希望他们能如老司马迁或老马克思一样，在一大段历史记述之后，言简意赅地点出其中的历史哲理。颇觉遗憾的是，老麦克在《起源》中的睿智与思辨，在此书中未得到尽情的发挥。

另一个感觉是，老麦克《起源》的写作结束在 80 年代初，当时中国的文革研究刚刚起步，也出版了几部“通史”性的简史。这几本简史对于当时号召的“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启发人们反思文革，诠释中央“决议”精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老麦克大概也就是在那时候进入他的新阶段——文革史研究。当时，中国人从崇尚文革，拥戴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试着批判文革，批评毛泽东。其理念大约与同时代的伤痕文学相类，基本处于控诉史学阶段。

90 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分化，一些人从文革与改革的右侧，来反思文革，批判体制；一些人则从左侧来重新诠释文革，维护毛泽东。而一度失语的当事人和漩涡中心者也重描现场，披露回忆。他们不满足于 80 年代对文革的“大批判”，不论其动机如何，大量的史实被披露和被解释，重估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发掘、展示民间思潮。这一切客观上都促进了文革研究的深化。尽管有的研究成果未能公开，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回归了史学而非政治宣传。

从文革发动 30 年到 40 年这十年间，一些研究成果逐渐出世。到 21 世纪初，

一些专著的出版、一些初稿的内部流传、一些体制内外的学术探讨，使得文革研究的深广度，史学的观念与 80 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有理由期盼本书也与时俱进，更客观更深刻地揭示这个历史过程。在 80 年代，海外学者确有这个优势；到 20 世纪末，他们本应该比此时的中国学者站得更高。

高在哪里？高在历史实证和历史哲学上。我注意到本书也关注了世纪交接阶段的文献学与文革学术动态，大概所引文献截至 2005 年，而中国国内思想界的新东西和反思的关键成果，没有被作者“捕捉”（*Capture*）到书里面，90 年代后期，中国人追赶的加速度与后劲，使得国内的速度比原来领先的外国朋友要快，似乎到文革 40 周年纪念前夕，老麦克已来不及追加更多的东西以增强原稿分量，作为稳健的学者，小迈克也感到不一定非得匆忙塞进去一些业已注意到的新史实和新观点了。诚然，史学不是时政，海外学者不需要看中国人的动向来确定自己的学术步伐。但 90 年代文革史学的确有一些重要变化和突破，即使 80 年代已奠定名声的王年一，也在修正他原来的一些认识和观点。

本书梳理的历史的脉络是清楚的，但这专题的史实与永恒话题还在不断充实和更新，况且告别历史现场愈久远，研究可能愈深刻。希望外国学者在读到新世纪逐渐披露的新资料和新的成果时，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会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学者刮目相看。

我是以阅读《史记》和马克思的史学论著的心情来期望此书的，自己眼高手低，做不到却来苛求两位作者。不过文化大革命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最高阶段，我只能这般教条且经验化地来企望了。

2010-06-26

【国史笔谈】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点意见](#)

[何 蜀](#)

面对这样一部由两个外国学者写成的全面、严肃而又生动、通俗的文革史，作为一个亲历过文革并致力于文革研究的中国人，首先感到的是惭愧。

因研究方法、思维习惯、观察角度、表述方式等等的不同，以及拥有史料的

丰富（有许多是我们很难看到的），尽管书中讲述的文革历史事件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读起来仍会感到十分新鲜，引人入胜，而且能给人许多新的启发。

此书的优点就不一一细说了。只谈几点在阅读中想到的意见，供作者参考。

群众造反运动

现在不论国内还是海外，都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是前三年，即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动文革到1969年中共“九大”，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文革，又主要是从1966年秋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8年秋各地群众造反组织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群众造反运动从兴起到终结的两年左右时间。这个观点，笔者始终认为如同把法国大革命只限于雅各宾专政时期一样，是不对的。现在的一些所谓“毛左派”和一些底层民众提出或希望“再来一次文革”，实际上也只是想再来一次那样的群众造反运动（他们当然不是想再来一次“清理阶级队伍”或“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那样的运动）。

这种把文革只等同于群众造反运动的认识固然不对，不过，群众造反运动，确实可以说是文革十年中最富特色、最“史无前例”的一段历史。因此，这一段时期里的群众造反运动也最值得好好研究。但是多年来的文革研究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各界受难者遭到的打击迫害，一是波诡云谲的高层权力斗争。一说到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则往往只想到红卫兵（而且往往是把初期的“老红卫兵”与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视为一体，混为一谈），很少关注到当时遍及各行业各领域各阶层的群众造反组织及其活动。

不知是出于了解情况和掌握资料的不足，还是对群众造反运动在文革中的重要性、独特性的认识不足，本书涉及群众造反运动的篇幅显然不够，只在第八章“天下大乱”中的“文革蔓延到农村和工厂”、“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两节里，第九章“上海‘一月风暴’”的“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上海工人造反”、“上海的‘一月风暴’”三节里，第十章“夺权”的“第一批革命委员会”一节里，及第十二章“武汉事件”、第十三章“五一六阴谋”、第十四章“红卫兵的消亡”中的一些内容里零星涉及到——从“红卫兵的消亡”这个标题也可看出，作者只注意到学生组织红卫兵的消亡，而没有注意到当时拥有人员更多、在一些地方起到了更为重要作用的工人、机关干部、农民、市民甚至军队领导机关（如军委各

总部机关、各军兵种机关、各大军区机关等)的官兵中的各色群众造反组织的消亡,及他们在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困兽犹斗。与此相关,对1967年2、3月间全国许多地区镇压造反派的“镇反”运动及4月开始纠正这一运动的大规模平反运动,书中几乎未提,只是在第十二章“武汉事件”中的“华中告急”一节里提到了武汉地区打击造反派的“镇反”。此外,还可作一对比:“清理阶级队伍”用了专门一章(第十五章),而主要打击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却只在“五一六阴谋”一章中的“保护周恩来”、“外地的清查运动”几节里用了很少的篇幅提及。相应的,在“批林批孔”一节(第二十一章)里,也只字未提各地普遍涌现的少数前造反派成员的“反潮流”活动(有的是为了争夺在“新生红色政权”中的地位,有的是为了争取给此前在“清队”、“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遭到的打击迫害平反),这一波“反潮流”相当于一次变相的、规模缩小的“造反运动”,而且在不少地方延续到了1975年,直接成为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的起因——在第二十二章“邓小平主政”中提到了“闹派性”,“打派仗”,但若前面缺少对群众造反组织派别冲突的叙述,不了解历史的读者很难懂得“派性”、“派仗”是什么意思。

“一打三反”运动

第十七章“胜利者的大会”最后一节是“‘一打三反’运动”。虽然只有一节,但却已经比中国大陆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化大革命史著作更加重视了文革中这一空前恐怖的、由官方公开进行的大规模迫害和屠杀运动。相比之下,国内文革史家的专著还很少这样为“一打三反”花费专门一节的笔墨,如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只在讲到“斗批改”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这一小节里附带提到“一打三反”(《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一版336—337页),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则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的文革部分也没有“一打三反”辞条,只在“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辞条中简略提及。

本书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作者对“一打三反”运动持续时限的认定也远比中国大陆文革史著述中的记载更为清晰准确。如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中提到“一打三反”运动时说:“从1970

年 2 月至 11 月的十个月时间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 28.48 万多名”（《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330 页，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 8 月第一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又说“据统计，1970 年 2 月到 11 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 万多名，捕了 28.48 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333 页）《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则称“一打三反”运动中“到 11 月底，全国共批准逮捕各种分子 28.48 万多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 9 千多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 5 月第一版，332 页）他们都把“一打三反”运动的时限划在 1970 年 2 月到 11 月之间，而本书则依据史料判定：“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 1970 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 1972 年、1973 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309 页）这是本书值得赞赏之处。

不过，作者对“一打三反”这一运动的真实了解可能不够（或是为一些不可靠的史料所迷惑），在论述中显得出人意外的偏颇。本来，“一打三反”运动的核心是“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实际上就是镇压政治犯，而这些政治犯中又主要是对毛泽东和文革不满的“言论犯”、“思想犯”，如北京的著名思想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公开为刘少奇、彭真鸣冤的北京自然博物馆解说员马正秀，公开书写反对文革的小标语到处散发的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王佩英；上海监狱中已关押多年的著名思想者林昭，因组织沪剧清唱而被诬为“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上海钢管厂司磅员、业余文艺爱好者谭元泉；江西省私下写作批判文革文章的南昌第一中学学生吴晓飞，大量著文全面批判文革路线、方针、政策的江西赣南医学专科学校教员陈耀庭与谢聚璋夫妇；福建省上书毛泽东为刘少奇辩护和反对文革的福清县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公安特派员陈寿图；江苏省多次上书毛泽东要求结束文革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陆兰秀；湖南省散发传单批判“三忠于”活动、批判文革的女知青丁祖晓、李启顺；甘肃省狱中关押多年的“《星火》反革命集团案”要犯张春元（兰州大学学生“右派”）和杜映华（前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陕西省因对 1957 年至文革中一些方针政

策不满而作过议论的西安第八设计院技术员施大伟，在家中保留了一些所谓“黑画”的西安市卫生宣教馆美工余正常；重庆市为刘少奇鸣冤的建设银行干部方运孚，散发传单公开否定文革及反右派、反胡风等政治运动并声讨“凌驾于党政军之上的阴谋家”的街道临时工、“摘帽右派”刘家瑞……这些“言论犯”、“思想犯”大多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并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示众后立即处决（个别在缓期执行中折磨致死）。当然，从人数上看，被处决的“言论犯”、“思想犯”只占“一打三反”中被处决者中很小的比例，但是，其他普通刑事犯所获的罪名（其中也有许多是夸大的甚至强加的）诸如贪污、偷盗、杀人、强奸之类是人们从来都知道不应做的，而“言论犯”、“思想犯”获罪的原因却是发表或流露不同政见、“关心国家大事”、“研读马列著作”甚至只是私下发发牢骚之类，人们从来不会认为这些是“犯罪”，而在“一打三反”中却成了“犯罪”而且是重罪，这就必然给社会造成极大的恐慌。

“一打三反”运动中还有两个十分突出的、有别于文革中其他整人运动的特点：一是中央将“杀人权”（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市、自治区（这一极为重要之点也被本书作者忽略）；二是大搞所谓“群众专政”，判决书都交“群众讨论定案”。当时全国笼罩于空前的“红色恐怖”之中。生活在重庆市的笔者就一直保留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忆：在“一打三反”高潮中的一段时间里，每到夜晚10点正，警备区的宣传车就驶上街头，在市中心马路上呼啸而过，男女播音员杀气腾腾的声音通过高音喇叭放大后在城市上空久久回荡：“最高指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戒严令……”然后是全城戒严，然后是在人们都已入睡之后的半夜里开始到一些人家“砰砰砰”打门“查户口”……

另一方面，许多地方还利用“一打三反”对前造反派人员进行了打击。吴德在回忆录中就说：“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77页）在“一打三反”中遭到了打击的前工人造反派成员陈益南则更是以亲身体会总结道：“（一打三反）在各地悄悄地演变成‘打击造反派中的

坏人’，甚至实际延伸为‘打击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但，什么是‘造反派中的坏人’呢？在进行中，也就实际成为了清算造反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即一切与文革前的标准不符的行为。什么武斗与打人啦，蓄谋造党委的反啦、夺权啦，无政府主义啦，还有就是读马列主义书籍的可疑行为啦，等等。”“实际上，正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完成了将造反派成员几乎全部从革委会中踢出去，而由保守派人员补台入内的权力机构的组织人事变动。”“全国大部分省份，由掌权的军方领导人与原来的地方老领导干部联手，大都成功地将‘一打三反’变为了一次清理造反派的运动。因而，除上海外，各地的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便纷纷被从‘新生的红色政权’即各级革命委员会中撵了出来，有的甚至还被送进了监狱。”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385、387、392页)

然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却在这一节里出现了对“一打三反”运动总体认识上的失误。书中除了提到宁夏银川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这一“思想犯”冤案外，强调的是打击其他罪犯，“在上海市闸北区，运动中只有6%的案子是政治问题，绝大多数是经济问题。许多‘群众宣判大会’的记录显示，运动的打击对象也包括大量的普通罪犯。从当时的普通百姓对于运动的理解来看，‘一打三反’的吸引力在于，确切地说，它给了人们希望。让某种曾经熟悉的‘法律与秩序’能得到重建，更有可能让‘好人’有机会镇住‘坏人’。”为了证明这一分析的可靠，作者还引用了一则当时北京市民在街道居委会组织的讨论会上拥护“一打三反”的发言(306—307页)。作者没有想到，在那样的“红色恐怖”氛围中，街道居民有谁敢说出真心话？谁敢不表示拥护？当时许多地方的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都把判决书发给群众讨论，而群众的表态几乎全是赞同“杀”！至于所谓“重建法律与秩序”则更是无稽之谈，当时全国都已按毛泽东的指示“砸烂公检法”，不再有什么依法审判，刑讯逼供成为常态(“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没有辩护，没有上诉，全是由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北京则是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连检察院都已完全不存在)的军代表作出判决，交革命委员会核心组成员(主要是军人和刚“解放”出来不久、唯恐被人怀疑“对毛主席不忠”的干部)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有何法制意义，可想而知。

作者本来在这一节里十分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各地以“地下”罪名打击各种民间社交活动、窒息社会生活的情况：“……任何松散的组织活动都可以被贴上

这个标签。于是乎，出现了‘地下图书馆’，‘地下音乐会’，‘地下工作室’和‘地下婚姻介绍所’。任何牵涉到一、两个人以上的事情都是‘帮’。上海的实际例子包括‘推翻新政权帮’、‘赌徒帮’、‘流氓阿飞帮’等等。”（307页）可是，作者却不恰当地引用了一则南京“青年歌唱队”成员悔过书中交待如何搞流氓活动和谈论下流话的内容。这样叙述的结果，显然只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一打三反”运动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成绩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尽管作者的这些叙述都有原始资料作为依据，但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都会明白，作者被一些表面文章，被一些不可靠的材料迷惑了，未能分析那些引用的资料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思想，是否能说明事情的本质。

作者在这一节里写了几句显得像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错误地假定‘一打三反’的对象几乎都是或者大部分必然是带有批判精神的青年学生，或者是在政治上敢于直言的干部。”（306页）这样的辩解大可不必，因为并没有谁作了这样绝对的“假定”。但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都知道，“一打三反”镇压的对象虽然并不“几乎都是”甚至大多数不是那些“言论犯”、“思想犯”，但这一运动以其他刑事罪名镇压的人员中也有许多是冤案。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

第十九章《林彪的叛逃和死亡》中的“庐山风云”一节里，针对庐山会议上“抨击张春桥就是攻击文革本身”这一说法，作者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见解：“但是到了1970年，林彪、陈伯达或者林彪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们没有理由如此反对文革，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文革的主要受益者。”作者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970年庐山会议不都是对文革的再度攻击，而是文革受益者的派系之争，目的是争夺毛的宠信。”（335页）

这一说法与官方有关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说法比较一致。但是这样认定“文革受益者没有理由反对文革”毕竟太机械，太简单化了。如果按照这样的“受益者”逻辑，就无法解释许多重大的历史变故，如法国大革命为什么是由旧体制受益者的贵族率先发动，否定斯大林的决定为什么是由斯大林时期的受益者赫鲁晓夫及其同僚们一致作出，抓捕“四人帮”、结束文革为什么是由文革的受益者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决定……历史是复杂的，人是

复杂的。受益者不等于就必然是使其受益的体制（或路线、政策、规章制度等等）的拥护者、捍卫者。

从总体上看，文革时期没有被打倒的军队领导人尽管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拥有了以往没有的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绝大多数人对文革这种“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始终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加上文革以来从罗瑞卿到贺龙、萧华、刘志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军队干部一批批遭到无妄之灾，“座上宾”转眼即可变成“阶下囚”造成的恐怖气氛，都使这些“受益者”人人自危，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要设法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把庐山上的那场斗争仅仅看成是“争宠”，未免把严峻的政治问题庸俗化了，而且，这也无法解释毛泽东怎么可能把一场“争宠”看得那么严重，提到了“政变”的高度。

另一些鸡毛蒜皮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表述不够准确的地方，如：

- **“1967年5月，文化部被撤销，其权力移交给了由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文艺组。”（161页）**

此说不确。文化部在中央文革文艺组成立时并未宣布撤销，只是作为要用“毛泽东思想”实行“砸烂”的单位而存在（当时有所谓“砸三旧”的提法，即“砸烂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中央文革文艺组成立后也从未说过接管文化部的权力，只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做一些文艺方面的督导工作（而且存活时间极短，其成员很快就陆续被打成“反革命”抓了起来）。1970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但在目前所见到的相关文字中也未见明确宣布撤销文化部（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353页）。1970年6月22日，中央批发国务院6月7日上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将各部、委、直属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合并为27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75页）。直到这时，文化部才正式由文化组取代了，但也不是撤销而只是改名。

- **（1966年底上海“康平路事件”之后，1967年）“1月1日凌晨1**

点，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下令，上海工人武装组织所属成员必须在 3 天内暂时上交所有的轻武器、步枪、手榴弹、轻机枪和重机枪、轻型火炮和弹药……”（165 页）

注释说明此段内容引自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识金著《将军卷进漩涡》一书。这本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到底是文艺作品还是历史著作且不管它，只就这段文字的内容看，就是让人难以置信的。众所周知，在 1966 年底的上海“康平路事件”时，上海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冲突中双方都还只是动拳头，当时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派别冲突都还没有达到动用枪支的地步，根本没有什么“工人武装组织”，不存在需要上交武器问题。如果上海竟然在 1966 年底就已经有了“工人武装组织”并且拥有了轻、重机枪甚至火炮，那可真是远远走在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前面了，因为全国各地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升级到动用枪支，普遍是在 1967 年夏秋之间的 7、8 月。因此，当时上海警备区会发出这样的命令是不可想象的。

- （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当他们在北京忙于国家事务时，主要由王洪文代理他们的工作。”（171 页）

当时在上海代理张、姚实际主持市革委会工作的是徐景贤，因此被上海人称为“徐老三”。

- （武汉的“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他们最终联合成立了‘武汉三钢’。”（203 页）

武汉的“三钢”并非什么联合成立的组织，只是因为“二司”、“工总”、“九一三”这三个组织在 1967 年 2、3 月“镇反”中被军区镇压时的顽强表现被人们誉为“钢”，美称为“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者并称“三钢”。

- （重庆武斗）“嘉陵江边上的朝天门码头在一次战斗中被夷为平地”。（220 页）

重庆的朝天门是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而不是只在“嘉陵江边上”，它是两江环抱的半岛形老城区高踞于江面的水运大码头。若是它被“夷为平地”，那江水岂不是就淹没山城了吗？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场面。

- （王力“八七讲话”）“王力的一番话迅即为红卫兵接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打开了绿灯。”（232 页）

从来没有发生过“红卫兵接管外交事务”的情况。红卫兵是学生组织，在外交部夺权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大多是工作能力很强、政治条件很好的外事干部）。而且所谓外交部的“夺权”，也只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对外交业务实行“监督”。

- “四川著名的造反派夫妻刘结挺、张西挺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把‘八大’产生的西南局强有力的领导人李井泉拉下了马”。
(297 页)

这句话有几个问题：

①说刘、张是“造反派夫妻”，说法不准确，因他们既不属于群众中的造反派，也没有像山东的王效禹、山西的刘格平、贵州的李再含、黑龙江的潘复生那样参加造反并领导当地的夺权，而是在文革前的官场倾轧中受到打击、文革中到北京上访申诉，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平反，被中央认定为“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中共中央关于四川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号文件，1967年4月4日），任命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成员。对于领导干部中的这类文革中得宠、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站在造反派一边与“走资派”斗争的人应该怎样称呼，值得研究。

②“在 1966 年至 1967 年间的冬天”，显然说的只是 1966 年的冬天。这样的表述显得有些别扭（不知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③“‘八大’产生的西南局……”中共“八大”是在 1956 年召开的，当时并未“产生西南局”，重新设立大区中央局是在“八大”闭幕几年后，1960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作出成立中央局的决定，1961 年 1 月 18 日经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

④“把李井泉拉下了马”，这有点像文革中造反派歌颂刘、张的语言。刘、张能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拉下马吗？红卫兵、造反派也没有这个本事。把李井泉拉下马的只能是毛泽东（以后也同样是他重新把李井泉又“扶上了马”而且不对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作任何说明），刘、张不过是被毛泽东临时利用的棋子而已。

- “林立果是一名军官，尽管年轻，却已在吴法宪的庇护下，执掌空军大权。” 337 页)

此说不确。林立果从未“执掌空军大权”。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曾对林

立果说过，“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但是，吴法宪后来在回忆中说：“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771页）

【史林一叶】

红卫兵抓走彭真

——对照民间记载与高层言辞的变化

范世涛

1966年12月4日凌晨，两辆满载红卫兵的汽车停在台基厂7号，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门卫进屋看信时，红卫兵强行冲进大门，将隔离审查中的彭真抢走，随后摆脱了追来的警卫人员。整个过程历时5到7分钟。

不少书刊谈及这一事件，但大都语焉不详，且情节出入很大。2010年7月，笔者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地摊上购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一位教师（暂不披露姓名）写的7册文革时期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其中记录了干校时期若干当事人在批清运动中的交代和军宣队对此事的调查。本文以《日记》记载的信息为基础，结合相关材料，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一简要回顾。

（一）事件经过

此事来由可以从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开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吴德等领导人参加了大会并发表讲话，谢镗忠宣布了中央军委决定：江青任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按照军委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将北京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

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按照毛泽东多次审改的讲话稿发表长篇讲话,称“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周恩来随后也作了长篇讲话,称文艺界为“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抗拒毛主席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毒素,创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要求“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

次日,即11月29日,一些参加了大会的红卫兵到叶楚梅(叶剑英之女)家开会研究斗争陆定一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叶楚梅之妹,她曾经在昨天的大会上发言)、北京电影学院彭宁(老红军彭加伦之子,导演系61级)、中央音乐学院刘诗昆,首都三司召集人、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后来也来到叶家参加了讨论。

中戏、北影、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原归文化部管辖,这几个单位红卫兵此前活动的重点在文化部。而江青在头一天的讲话指出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相互勾结”,为什么不把批斗“黑帮”与破“三旧”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找更“大个的”呢?虽然陆定一比周扬的“个头”更大,但彭真不是更大的目标吗?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有人从游斗陆定一的汽车问题跳到批斗彭真问题时,与会者均热情响应。在红卫兵中有很影响的朱成昭也拍板同意。几年之后,会议参与者彭宁说这次会议是“捉彭的雏形”(《日记》,1971年8月29日条),另一位抓彭行动参与者钱学格说“这显然是一个决定性的会议”(《日记》1971年8月17日条)。

彭真当时在家中隔离反省,警卫严密,怎样把彭真弄出来呢?红卫兵们进行了严密的策划。12月1日他们确定,行动由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乐团四个单位参加。当天叶向真在戏剧学院传达,刘诗昆去音乐学院做了传达;12月2日早晨叶向真找电影学院的彭宁讲话,彭宁随后告知

杨韬，要抓大头，揪彭真，说他是海瑞式人物，同日晚有人去摸彭真的住址，研究具体抓法。

12月3日晚是最后的布置会。叶向真主持会议，她讲了为何要抓彭真，并说已经与戚本禹通过电话；彭宁赞成叶的发言，并宣布了抓人名单，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大家研究了“黑帮”抓来后住什么地方，陈立提出住中央乐团；大家还商定了游斗路线，决定各单位在农业展览馆集合，随后沿东西长安街过天安门游街；朱明宣布，四个单位的头头担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务，刘诗昆、彭宁负责相关宣传；行动总指挥是郑国喜（因字迹潦草，此人名尚待进一步考证）、叶向真、孙增华（《日记》1971年8月27日条）。

另据《日记》1971年5月3日条记载，北京电影学院参与策划的红卫兵有彭宁、孙增华、孔都、朱喜年、张泽宇，参加此事者有钱学格、滕文骥、丁荫楠、杨韬、司徒，现场指挥有吕英亮、孙英、崔雁敏、刘建革、何玲（俞家熙）、张克敏、李国基、曲??（看不清楚）。

接下来，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

事发当天，周恩来总理对叶向真、彭宁等红卫兵说，“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司令部都给瞒过了。”（《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载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1967年2月）；

江青对傅崇碧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区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见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吴德这样描述：“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厂7号，被不知什么人抓走了，是1966年下半年，具体月份记不准。周总理在大会堂找我、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谈话，让我们去把彭真找回来。周总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么人

把他揪走的。我们派人去，茫无头绪，找也找不到。”（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显然，如果从红卫兵的角度看，他们的行动很成功。

（二）“中央文革小组操纵”？

很多年以后，吴德说，“实际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搞的”（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抓彭行动总指挥之一叶向真也说，中央文革小组“下了指令”（凌孜的回忆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3/03/content_19509211.htm）；

童小鹏则指名道姓说红卫兵抓走彭真是“江青指使”（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

傅崇碧说，这是“江青、戚本禹等策动”（傅崇碧《大树参天护英华》）。

12月4日红卫兵突破警卫抓走彭真，果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指使”、“指令”或“策动”吗？

从《日记》来看，只有一条信息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红卫兵12月4日行动直接相关。这就是12月2日或3日，叶向真在行动前就电话问过戚本禹（1971年8月27日条），戚本禹当时的回答是：“你们看着办”（1970年12月5日条）这个回答符合戚当时的身份——既不明确阻止，也不明确支持，虽然红卫兵通常理解为支持，但这与“下了指令”、“指使”、“操纵”或“策动”毕竟不是一回事。

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信息表明这次行动得到过江青、陈伯达或王、关、戚的“支持”。

《日记》是否没有充分反映中央文革小组与12月4日行动之间的直接联系呢？这也不大可能。在清查“5·16分子”运动中，抓彭行动被列为“5·16反革命专案”。江青当时是“中央首长”、“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中央专案组最高领导人之一，如果抓彭得到过江青“指使”或“指令”，此事列为重点清查案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时，“王、关、戚”或陈伯达已先后被视为“5·16反

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但凡与他们能挂上钩的造反活动都被系统追溯和清理。如《日记》1971年8月17日条，就记下了彭宁交代的与戚本禹的7次接触，时间分别是1966年9月25日、12月4日、12月12日、12月22日（斗彭大会）、12月23日（“首长接见”，可能指江青接见，戚本禹也在场）、1967年1月14日（文化部）、6月23日（中宣部）。假如12月4日的行动事先有王、关、戚或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具体“策划”、“指使”、“策动”或“指令”，在长期反复交叉问讯压力下，是不大可能挖不出来的。

同时，《日记》有明确的记载表明抓彭真是红卫兵主动发起的。如11月24日，首都三司的召集人朱成昭到文化部，谈形势时就已经提到“文艺界斗黑帮，抓出来，已养得胖胖的，有上线”，让“文艺界自己搞，告叶向真、彭宁。”（《日记》1971年8月27日条）这表明首都三司的造反活动中，叶向真和彭宁分工负责文艺口。作为抓彭行动的“雏形”和“决定性会议”，11月29日在叶楚梅家的会议本来商量的是游斗陆定一问题，而非抓彭问题，话题转到抓彭，其实是即兴性质的。

因此，我认为说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策动”或“指令”红卫兵抓彭真不符合事实；12月4日抓走彭真，只是中央戏剧学院等四个单位红卫兵在特定环境下的主动行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的结果。

（三）“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彭真忽然被人抓走，中央怎样反应呢？

吴德在口述回忆中说，周总理找了汪东兴、傅崇碧、周荣鑫和吴德，让他们弄清楚彭真的下落，结果却茫无头绪。随后傅崇碧对周总理说，这件事要找戚本禹。戚本禹果然“一找就找着了。好像把彭真关在了戏剧学院”。

吴德这段回忆有两个地方不准确：一是戚本禹也只是很快就确认了此事系叶向真等人所为，并非“一找就找着了”彭真在什么地方。二是彭真被抓走后，先被关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而不是戏剧学院，随后又被转移到了西山山沟里。

吴德还说：“知道彭真的下落后，周总理叫我们负责要回来。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来，最好是由傅崇碧、卫戍区出面交涉，把彭真放在卫戍区监护，他们

什么时候要批斗，卫戍区什么时候就送去。”

去西山要回彭真确实是卫戍区部队所为。接受任务的战士每人都带了一条背包带，傅崇碧说“做什么用，你们去想”。据说救出彭真时，彭“在西山被折磨得早已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也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拉代替。”（刘焯《特监轶事》，人民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98-99页）

不过，吴德的口述回忆给人一种印象，与红卫兵交涉的似乎主要是北京卫戍区，其实，周恩来才是与红卫兵交涉的最主要人物。

据《日记》1971年5月3日条记载，彭真被抓走后，周总理在12月4日三次接见有关单位红卫兵。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在凌晨，电影学院参加接见的是张泽宇；第三次接见在傍晚4、5点钟，电影学院参加接见的是彭宁、孙增华、张泽宇。三次接见的主要内容是：1、批评这事先未向中央打招呼，中央被动，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积极与卫戍区配合；2、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动；3、总理指示中央由汪东兴、吴德、戚本禹、周荣鑫负责。

如果说上述内容过于简略，当时群众组织编印的资料汇编中收录的“12月4日周总理接见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四单位三司所属红卫兵组织代表的谈话纪要”就比较清楚了：

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首先鼓励你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这种义愤心情，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存在反扑，要给予反击，反扑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扑，机关里有，学校里就更多了。有斗争的反复可以锻炼我们。尤其在北京，林彪同志负责这个地方，他们就更不甘心了。

我们每个行动都要估计，要再三估计，考虑到后果。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仅五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干得漂亮！你们把警备卫戍司令部都给瞒过了。

你们的行动是好的，但不可能没有缺点，你们如何配合中央，请大家考

虑。

“三极”宣传想得很理想，做出来很不好办。长安街的人那么多，你们怎么走得动？很不好办，如果出点事情，很麻烦。所以要我来说服你们……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游街示众，我们感觉没把握……开大会这个办法好，可以出出你们的气，当然不仅是你们的气罗，而是公气。

(见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 501 页，1967 年 2 月。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从内容判断，这个纪要是 12 月 4 日下午 4、5 点钟周恩来第三次、而不是前两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内容；其中提到“现在确实像上午同志们分析的”，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周恩来当天上午已经接见过参与行动的红卫兵。

周恩来说，“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表明他比戚本禹事先的“你们看着办”更前进了一步，在事后主要是认可、支持和鼓励这一行动的。他说，“你们走后我们召开了中央会议”、“要我来说服你们”，那么，他的意见也就不仅是他自己的意见，而是代表了中央的意见。从周恩来和彭真的地位推测，“要我来说服”的人，未必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很可能是毛泽东。

周恩来对红卫兵“革命行动”的支持不只是口头上的，还有两项实质性内容：一是红卫兵原计划是四个单位在农展馆集合，然后沿东西长安街带“黑帮”游街示众，而周恩来指出，“这样搞不安全，斗争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开会时，我们都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开大会这个办法好”；二是红卫兵关于 12 月 4 日行动的策划没有超出江青在 11 月 28 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所谓的“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相互勾结”范围，他们也找不到远在山西的杨尚昆住处，但周恩来对红卫兵说，“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参见凌孜回忆，出处同前) 从而帮助红卫兵将游街示众斗“黑帮”的计划转为“斗争彭、陆、罗、杨”的大会，杨尚昆也果

然在不久之后被及时送回北京。

关于筹备“斗争彭、陆、罗、杨”大会的过程，吴德这样回忆：

周总理让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个造反组织联合起来召开批斗大会。我去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提出他们是否和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师大的什么组织联合起来召开大会，避免发生冲突。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联合批斗。

我又去找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质部或是地质学院的四楼上。我和丁国钰去后，但见朱成昭的楼层层设置了他的警卫。我说找朱成昭谈事情。这些警卫让我们等着，他们去报告获准才让我们上去。我向朱成昭谈了联合召开大会斗争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联合开会，但他提出条件，这个大会要由他们来主持。我提出让他问一问北航的韩爱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当场打电话把韩爱晶和韩的一个女秘书小朱请来了。韩爱晶来后，我告诉他们说，周总理的意见是各派联合起来开大会，至于你们谁主持，你们自己商量，也可以轮流主持。

说通朱成昭、韩爱晶，又找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经他们反复商量，决定联合开大会，先由地质学院东方红主持，然后是戏剧学院的造反派主持。

这个会还没有开，这些造反派又为由谁主持批判会吵架了，我又去劝架。在劝架过程中，这些造反派忽又钻出一个念头，他们说斗彭真是为了转移对北京市委“资反路线”的视线，这是北京市委在捣鬼，是北京市委的阴谋。矛头对着我来了。我分辩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这是由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不信可以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我挂起电话，好像是陈伯达的秘书接的。我说：他们说我们在搞阴谋，转移视线，我们说服不了这些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人到会。来的人好像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他们表示支持召开联合批斗大会，并说这不是市委的阴谋，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戚本禹没有说几句话，他们就同意开会了。（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

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就这样，一次四单位红卫兵的突然袭击行动，在中央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为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这次大会有12万人参加，姚文元、吴德出席会议，一批所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揪至会上接受批斗，彭宁做了大会发言。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讲话，“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所谓“英雄行为”，自然包括四单位红卫兵突破警戒抓走彭真的行动，也包括他们同意与其他单位联合召开大会。

（四）“七分钟反革命事件”

数年之后，红卫兵抓走彭真的事再次被提起，不过不再是“革命行动”或“英雄行为”，而是“上面有人”（暗指戚本禹）的“七分钟绑架彭真事件”（简称“七分钟事件”、“七分钟反革命事件”），又称“12.4事件”了。这个变化的关键人物还是周恩来。

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与康生、江青一起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作了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一一介绍了所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人物，他这样描述戚本禹：“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又说“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

为了说明戚本禹“根子是很深的”、“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周恩来提到了抓走彭真的事：

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笙，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

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得非常不利。(《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41869>)

上述表态与“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不可同日而语，这时抓走彭真变成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超过了武斗”的“绑架”；杨尚昆也不再是由中央从山西押回北京交给红卫兵批斗的，而是叶向真等人“一下子逮走”的一员。

新的政治定性对叶向真必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叶向真专案由中央专案组三办负责，我们无从了解详情。幸好，《日记》系统记录了北京电影学院下放干校时期遵照周恩来指示清查“5·16”分子运动的大量细节。根据《日记》记载，全程参与了“七分钟事件”的彭宁，是其所在干校连队的首要“5·16反革命骨干”，“七分钟事件”作为他的主要“罪行”之一被反复批判。下面从《日记》中做一些简单摘引，可以约略了解当时的情形。

1970年12月4日，一位姓崔的连长在“大批判再动员”后，布置了第一项专题批判任务，即“利用红旗政策。重点批判7分钟事件。”方法是“先典型批判，后群众批判”，“普遍批判在班进行”，要求“从线索摸敌情”，“一定要结合事实，不要乱扣帽子”，“关键在相信不相信党的政策，自己解放自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才能真正划清界限”。

次日，连队召开“5·16反革命阴谋集团12.4（七分钟）事件批判大会”，彭宁、钱学格、马精武、谢飞“怀着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的心情”上台发言。《日记》作者的发言提纲是这样的：

1966年12月4日，正当我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一伙即将

摇摇欲坠倒台的时候，一小撮阶级敌人、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开始制造舆论，捞取政治资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王、关、戚、杨、余、傅直接策划演出了七分钟绑架彭真的反革命特务事件。这个事件的要害就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施加压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图挽救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一伙失去的天堂。这个反革命七分钟事件的要害，就是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5·16 反革命阴谋集团夺权的目的，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单是要彭真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一起串供，而是王、关、戚、杨、余、傅和他们一起串通起来，搞复辟阴谋活动，蒙骗人民。（《日记》1970年12月5日条）

会上另一位“五七战士”说，1966年12月4日抓走彭真是为了“串供”，而且“阴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彭真及一些黑帮串供，制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政变的一次演习，危害已经造成了。”周恩来1966年12月4日的表态被说成是红卫兵们“掩盖和篡改周总理指示，放反革命舆论”。崔连长评论说，“抓彭真即保彭真保黑帮”。

当晚崔连长传达了“最新指示”（其实是1967年的），“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以及林副主席指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随后长篇大论，要求人人发言，“不发言就是中奸计”，“红旗政策恶毒之处在利用人心所向勾引青年，非如此不能号召”，并将“七分钟事件”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说一些人“在七分钟事件中，自己还庆幸是机会主义的头脑，其实已经上了三十年代的贼船。”

群众发动起来后，接下来的11个月是高密度的批斗。连队领导带头做“工作”，彭宁反复交代“5·16罪行”，写出了140多页的材料，其中包括“七分钟事件”，但这些交代被一再指责为“重复”；彭宁本人不断受到“背后有人”、“态度不老实”、“错误估计形势”、“掩盖罪行”、“避重就轻”、“狡辩”、“想蒙混过关”、

“新的恶毒攻击”、“继续阴谋新反扑”、“以细节掩盖实质”、“搞迷魂阵，反攻倒算”之类的斥责，人们一再勒令他“严肃对待自己的罪行”、“竹筒倒豆子”。有些当事人则发挥了揭发、质问的作用，有的可能参加了专案组，在会上专题介绍过“七分钟（事件）彭宁参与阴谋”的过程。

经历持久地“斗立场、斗态度”、“通过罪行打态度”后，彭宁渐渐承受不住压力，1971年10月4日开始交代天方夜谭式的“反革命计划”，但大家很快发现他的交代“不能自圆其说，掩盖阴谋。交代有阴谋有组织，实际又无阴谋无组织，自己推翻了，漏掉了。”（1971年10月27日条）

幸好，1971年10月下旬，连队内部传达了关于“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的文件，11月初文件在班里见面，运动的方向和重点从此转到林彪问题上，“斗彭”变得不再重要，有关“七分钟事件”的密集批判也不了了之。

8月20日初稿

9月19日定稿

【史林一叶】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

阎长贵

毛泽东在逝世前一两年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说要“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说三分错误的表现有两点：一曰“打倒一切”；一曰“全面内战”。邓小平说：“只就这两点讲，就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现在姑且不说“打倒一切”，我们只谈谈“全面内战”。在和平建设时期，搞什么“全国全面内战”，这意味着什么，其后果如何，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有深切体会的。

文化大革命，搞得中国到处一片狼藉和混乱，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族人民都是一场浩劫。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重要原因，就是全国全面内战。在文化大革命中，九州大地，七亿人口，党员和党员之间，

群众相互之间，这派和那派之间，互相对立，甚至互相残杀，所动用的器具，从冷兵器到热兵器，从砖头、棍棒到机关枪、大炮，无所不用其极。其场面之惨烈，火药味之浓，和我们过去的内战相比，难分伯仲。恐怖气氛笼罩神州，可谓“全国全面恐怖”。“内战”也者，按照词源意义及人们通常理解，就是“战争行为和战争状态”。说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内战”，倒很形象，一点不错。

然而，这全国全面内战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偶然的和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固然不可否认“某次战役”有群众的自发性因素或偶然性因素，但“全国全面内战”决不是群众自发搞得起来的，决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它是文化大革命立意要大乱和搞乱全国的内在要求，并有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亲自和直接号召，并且双方也都是打着“为毛主席而战”的旗号。

说“全国全面内战”是最高指示，这令人难以置信，但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举行的生日家宴上，他对被邀请参加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在场）等人，就是这样说的：“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当然，毛泽东在这次生日家宴上，不止说了这一句话，实际上，说了很多、很长的话，但其总括语，或总概念，就是“全国全面内战”。这一点，仿佛还不为人们所知，或不为人们清楚和明确地所知。我们看看参加这次家宴的几个人说法。

姚文元的说法——

1966年12月27日，姚文元给上海的徐景贤打电话说：“昨天晚上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毛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徐景贤问姚文元：“毛主席的指示可不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范围内开会传达？”姚文元说：“不要开大会，你们先在小范围里吹吹风吧！”当天晚上，徐景贤就主持召开了一个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骨干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听后很兴奋，争先恐后发言。在讨论中，徐景贤提醒大家思考：“毛主席说的全国全面内战开始了，究竟有什么样的深刻含义？我们该怎么做？”（参看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4月第二版，第7-8页）不难看出，姚文元说得十分明确，徐景贤的领会也不含糊。

戚本禹的说法——

戚本禹 1967 年 1 月 10 日凌晨在总政话剧团接见部分革命造反者，谈到形势时说：“最近主席指示的精神都要传达下去。现在形势一句话，概括地讲，全民的全国的阶级斗争，各个战线，各个地区，用火药味的话来说，就是全面展开内战。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其原因就是十七年以来，资产阶级在全面地对我们挑战，我们是应战，全面地应战，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两个阶级的斗争达到十七年的最高峰。”（参见 1967 年 3 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第 1 册第 84 页）戚本禹也是宣传毛主席的开展“全面内战”的指示和号召；显然，如果不是毛主席这样讲过，他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讲的。

关锋的说法——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一次谈话中，关锋和我谈到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主席生日家宴的情况，他说：“在这次生日家宴上，毛主席向大家祝酒时说：‘为开展全国全面内战干杯！’我听了，都怔住了，觉得不好理解，所以根据毛主席在生日家宴上的讲话写 1967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没敢这样写，而改成了‘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关锋的说法表明，当时已经极左的他都觉得有点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了。

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情况下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证明：毛主席确实说了或说过“全国全面内战”。唯毛主席生日家宴时也在场，同时参加起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王力，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从来没听他说过。”（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册第 696 页）看来，王力实在是忘记了——这一点也不奇怪，人们的记忆常有这样的事情；不过，王力的说法丝毫不能否定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的说法。毛泽东在 1966 年 12 月 26 日的生日家宴上的祝酒词究竟是什么：“全国全面内战”，还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这桩历史公案，应该说，可以做出明确的答案，而不必也不要再使它成为历史之谜了。

毛主席关于“开展全国全面内战”的指示和号召，虽然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上被修改成“全国全面阶级斗争”（这个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但其实质未变，因而当它一诉诸当时疯狂的造反大众，所引起的就是风行全国的

你死我活的全面内战。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不折不扣地变成了触及（不仅触及，而且伤害、残害）人们肉体的“武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夺权”的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可悲也夫！可叹也夫！

毛泽东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展“全面内战”的说法，还有一个例证。1970年12月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向他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a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全面内战”所持的欣赏、肯定态度，否则不会说“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这同他当初以开展“全国全面内战”为祝酒辞是一脉相承的。

【乱世民情】

沈邱“锻炼”琐记

——田园生活与“反标”事件

漂 木

据说是纪登奎的批示，1970年3月，河南省在军垦农场锻炼的大学生，统统转赴县以下单位，参加“农业学大寨”、“一打三反”、“整建党”运动。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要“十年见成效”。

我被分配到豫皖边界的穷乡僻壤沈邱县，和县革委会工作队一起下到整建党的重点大队——三大夫营。大队党支部书记，近三十岁的造反派负责人，在观察我两天之后诚恳地问我：“听说大学生戴眼镜是由地委书记批准的？”

像我这样分到这个县的大学生有几十个，白天在地里跟社员干活，晚上组织政治学习，学“九大”党章。大队干部说我是南方人，至少吃过大米，于是就让我试验种植水稻，十个生产小队共拿出一百亩地，十个劳力十头牛。秧苗成活后，一切渐渐走上正规，每天就剩我和看抽水机的小伙子。他去摸小鱼，我则静心躺在田边的窝棚里，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渴了，就放柴油机的冷却水喝，倒

也十分惬意。没想到秋收时麦茬稻单产 600~800 斤，一季产量就“过了江”。当时分到农户家吃饭，那家姑娘头一次分稻就用碓窝舂米熬粥给我喝，当然是奖励我。说实话，到今天我还认为那段田园生活是有价值的，憨厚的农民给了我做人的启迪。

1971 年，“一打三反”结束，政治学习单调乏味，已集合不起人；而农民种麦茬稻比我都老练了。这样，白天晚上自由的时间更多，我便系统地阅读马列原著，以及毛泽东 1958—1961 年的文章。我对河南“大跃进”、“共产风”的批判实际上是从这时开始的。农民对那个时期切身经历的描绘，对那段生活的厌倦与嘲讽，又给我好多感性认识。

下乡大学生的生活日渐散漫，每月一次的小聚会，喝酒赛诗，一聚就是一、两天。

附近县的林场是中联部五七干校，有好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还有些年龄与我接近的 64、65 届大学生。因为金日成访华时从干校临时抽调的翻译表达不准确，金日成当场纠正了翻译，周总理很不高兴，于是要求干校加强外语学习。干校学员可以凭当时最奢侈的传媒工具——半导体收音机，听“美国之音”了。我常去林场买水果，也喜欢跟“五七”战士聊天，议论时事——印支战火正紧。

实际上真正的紧张并不在印度支那半岛。有如晴天霹雳，出现了“9.13”事件。文件传达到县里的党员干部时，大学生也从“美国之音”收听到了。我们注意到，听完传达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言，蹬上自行车回家了。有个公社的驻队大学生说了一个段子：一个干部什么也不说就回家，抱着自己的老婆泣不成声。我们笑话县里的干部太单纯，其实自己也不轻松。我说拥戴了一个叛徒，真伤人自尊心。一个北京来的老大学生说：“我早就没自尊心了。”（他 70 年代后期回到北京，现在是一个部的副司长。）另外两个嚷道：“得把这几年的中央文件找来重看看！”好像不怕再有什么彭真的“畅观楼事件”。

林彪出事，乡里的阶级斗争气氛重新紧张，夜间还组织了民兵持枪巡村。工作队也加强了，县人武部副政委来担任队长。他算是我的大同乡，但是冷峻、傲慢。驻队干部又开始每天上午集中学习，可能因为我普通话标准，就由我来读文件；学“国际歌”，常常也是由我教唱。

一天早读，我一进场，所有的干部都用异样眼光瞄我、躲躲闪闪。文件由另

一位干部读了。经验告诉我，要出什么事了。1963年，我与陈毅的侄子曾上书中央，希望展开新的思想整风运动，文革前就成了有问题学生。文革一开始，被打成破坏文化革命的“右派”学生，省委书记点名，“枪打出头鸟”。反反复复被整过。可是，苦苦思索，我也想不出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副政委仍是平静而冷峻地看着我。

过了几天，工作队中一位原县团委的干部（长我几岁，喜欢到我住处，翻我的书，说他是保守派，下乡来锻炼改造的），趁没人的时候悄悄把我拉到僻静处，问我会不会写英文。我好生奇怪，写英文干吗？他神秘、焦急地叮嘱我，一定要冷静，要经受住考验，中联部干校过来的路边小桥上，发现粉笔写的“**Long Live Jiang**”，有人认为写的是“蒋万岁”。副政委就是公检法的军管负责人，正在查反动标语，他们商量了让我去对笔迹。

我无话可说，能说什么？唯有诚挚地谢谢他的“通风报信”，他一再忠告，要我自然地按自己原来的写字的样子写。

悲哀、愤怒、好笑、无奈，我的确没放弃英语。英文版的毛选我常常读到深夜，而且选一些论军事的读。我总想，有一天我们可能去印度支那，援助越南、老挝。一张印度支那大地图就贴在床边的泥墙上。读报读书后常常端起油灯查看战事进展如何。人们的境界相差太远了。而且从文革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的政治思想境界为什么总是恰恰相反？《逍遥游》里那大鹏和猫头鹰的理想冲突处处都有。你想择栖息之梧桐树，他以为你要抢他的死老鼠！中联部干校懂外语的人多，就是有暗藏的反革命，有必要去写什么标语吗？何况，那标语到底写的是“蒋万岁”还是“江（青）万岁”谁能说得清楚？

傲慢、冷峻的副政委始终没找我去对笔迹。

两年之后，我知道了更多，那副政委压根就是冲着我来的。“批林整风”中批判军队干部那几年的错误时，组织部有人告诉我，1971年初，我的母校又送材料到距他们千里之外且在外省的县城，并向当地领导要求，取消我的大学生分配资格就地劳改。军管公检法的副政委，已确定将我划入“5·16”名单，并报地委逮捕。不知是部长不同意还是县革委内的地方干部不同意，仅仅把我“内控”了一下。这些大约是一位县团委干部当时也不知道的。

我妻子说我命里有贵人，遇事有人帮，我信。从当年血气方刚一步一步走过

来的三十多年岁月中，当年向中央上书的“大逆不道”、文革中打成“右派学生”遭批斗，一直像阴影一样紧缠着我，1986年才多方争取到的那一纸平反决定，不过是欲盖弥彰。我算是明白了那些右派分子，为什么“改正”了还不痛快，电影演了还要写书，一直说到现在还不尽兴、解气。因为，一些道貌岸然的、正统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尤其是那些当年把别人打成右派的人，还是认为：就算不是右派，你总有错误有问题吧。他们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

让我欣慰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遇到了许多好人，包括那在两可之间没有选择逮捕我的那种也许会被认为是“庸人”的干部。

1995年初稿，2000年修改

【乱世民情】

那天，我们没有哭

蒋 健

那天——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一)

那天我很早就醒了，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出大事的预感，而是因为一架接一架的飞机在凌晨掠过北京城区的上空，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看起来是出大事了。

那时因为唐山大地震的缘故，我和很多人一起住在抗震棚里，长长的、密密的几排。天亮后，还没到上班的时间，军人们就被紧急召集去开会了。

一定是出大事了！

不过，我们还是照常生活，尽管心里有些不安。那时我们正在劳动，任务是拆除或者修补被地震损坏的房屋。大家在一起议论、猜测着，也许是毛主席悬了，毕竟6月份就有通知说他老人家身体不好，今后再也不能接见外宾了。

大概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我们劳动地点对面的北京50中和108中的主楼顶上突然升起了国旗，非常的惹眼。

没过多长时间，突然降了半旗，更加的惹眼。

几乎与此同时，附近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反复说“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一定是出大事了！一定是毛主席“驾崩”了。

大家赶快停下手中的活计，默默地去了住在附近的北空生活区“红楼”的来小康家。不大的屋子里挤了20来个人，所有人的神情都很肃穆，静静地听着讣告（《告全国人民书》）。在讣告播送完后，大家静默了几分钟，最后来小康冒出了一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在座的所有人没有哭，与1月份周总理去世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这真的让人感到奇怪。

怀着沉重的心情回了家。不，先是回了抗震棚，看到父辈们不在以及他们留下的条子，知道他们已经决定回家去住了。

毛主席走了，我们将来的生活肯定会出现变化。

不过，我们当天的生活变化就是从抗震棚搬回家里来住了。

也许是毛主席之死引起的沉痛让我们忽视了死亡的危险和威胁，虽然那天有很多人没有哭。

（二）

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五口人没有哭的，就是反复看电视、听广播……

我有些奇怪，心想他们或许是在单位哭过了。

还记得1月9日的早晨，我是被父亲的嚎啕大哭惊醒的，当时他真如丧考妣，甚至说如果能够拿自己的生命换给周总理该多好啊。

难道是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没有周总理深？

我心想也许吧，因为我也觉得周总理更大公无私。我们这辈人为周总理1月哭过，3月哭过，4月闹过……

记得7月6日朱德去世后，北京很平静，虽然有红头文件提醒不要让反革命分子钻空子，不要搞集会，毕竟“四五反革命事件”刚过去不久……但的确不见周围的人有任何哀痛的表现，更没有悲伤的气氛。事后出于好奇，问父亲为什么部队的人反应也这样平淡，朱德毕竟是总司令、红军之父啊。父亲答说，朱老总老犯错误、写检查，陈（毅）老总批评他的讲话文革前就在部队传达过，而且朱

老总早就不做具体工作了……

此时，大概是父亲也觉得压抑、奇怪，两天后他拿回一张《参考消息》，特意指着一条“这个电梯乘务员看起来比 1 月周恩来去世时哭得还伤心”的报道让我看。父亲那意思是说毛主席还是比周总理更重要……

那时对全国各地悼念活动的报道太多了。不过，那段时间，周围人确实看不出有多悲伤，虽然大家确实停止了有可能会出大动静的活动。我记得有个“另类”显得特别出格，那就是我们年轻的司令员、抗美援朝的空战英雄刘玉堤，他照样天天黄昏时分与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打羽毛球……

为什么人们不太悲伤呢？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原因是为周总理尽情的悲伤之举遭到了指责；第二个原因是对“四五反革命事件”的追查使人们的心态起了变化；第三个原因是唐山大地震带给人们的悲伤太多了，比如我熟悉的一些同学和长辈就死于这场灾难；第四个原因恐怕是对毛主席吹得太过了，除了连篇累牍不加节制的报道外，还要举行百万人的追悼会（这规模远非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模能比）；第五个原因也许是和天气有关，北京的秋天实在太美了，而总理去世的 1 月真是天幕低垂、愁云惨淡。当然第六个原因也许最重要，人们关注并忧虑着国家的政局走向。

（三）

在给毛主席治丧期间，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百万人的追悼大会。

我们的班主任（因为他长得黑而且有凶相，所以我们背后叫他“黑雷子”）一开始就对我们渲染说这个追悼会至少会有 50 万人参加，而且时间不会少于四个小时。他告诉我们斯大林去世时北京开了个 30 万人参加的追悼会，持续了四个半小时。

我对“黑雷子”的话半信半疑，50 万人怎么塞？这么长时间那些老人怎么受得了？出席的群众还不得站上八小时啊……

回去问父亲：斯大林的追悼会真的开那么长时间？毛主席他们也就在那儿站了四个多小时？

父亲说确实开了很长时间，当时朝鲜战争还没结束，他们是在丹东（安东）悼念斯大林的，哭声一片……

很快有了确信，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决定举行百万人参加的追悼会。

听了这消息后，我心想这“黑雷子”不愧是“雷子”，说得还挺准。

可参加百万人追悼大会的人要从哪找？怎么选？我私下想。

不过，很快就明确了：一要政治上可靠，二要身体上过硬。

落实到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班的情况是挑 15 个代表。而我们班的四、五十个人至少从表面上看都非常想承担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当时我们班有两个共产党员，12 个共青团员，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革命群众”可以参加。

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唯一的、荣幸的“革命群众”。

大家都写了“请战书”，我不仅临时抱佛脚突击写了入团申请书以表示政治上进步，还主动去找“黑雷子”谈心，吹嘘我的身体不错，并告诉他：在 1969 年抗议苏修新沙皇入侵我神圣领土珍宝岛的活动中，我曾经连续游行七个小时；在年初悼念周总理的自发活动中，我曾经在凛冽的寒风中伫立好几个小时……

当然，我没好意思提清明节期间，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的事，因为他知道。不过，当时去天安门广场传抄“反革命诗词”的人当中党、团员也不少。

谈心过程中，“黑雷子”频频点头，我觉得他好善解人意啊！

在公布参加追悼会人员名单之前，“黑雷子”煞有介事地强调困难，比如说要站好几个小时、不能吃东西喝水、不能上厕所，还要做防止苏联突然袭击的准备……

等名单公布，我心花怒放，可我的哥们儿陈秋尔不干了，他是共青团员，可却成了唯一被“剥夺”了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权力的共青团员，他一开始还一本正经地大闹，可“黑雷子”强调这是对他的关心，是怕他身体吃不消，而且拿出证据说，他从来没下乡参加学农劳动过……

（四）

9 月 18 日，从清晨开始，百万北京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从四面八方向毛主席追悼会会场汇集。父亲和哥哥上午就出发了，我们则是中午 1 点钟在学校集合，然后步行去指定地点，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着郭沫若题写的“东单菜市场”牌匾。我们和先到者一样，秩序井然地肃立着，而在我们的东面陆续有一些队伍

走了进来。

下午3时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百万人默哀3分钟，军乐团奏起哀乐。

因为治丧委员会规定9月18日下午3时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鸣笛3分钟致哀，所以我们在默哀的三分钟里仍能在哀乐的间隙中清晰地听到北京站方向的汽笛声。

默哀完毕，军乐团又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

随后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尽管华国锋的悼词高度评价了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但与九天来的报道相比，没有什么新内容，再加上华国锋的语调远不能和夏青相比，因此在会场上没有出现想象的悲痛场面。

在华国锋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之后，主持大会的王洪文招呼全体人员向毛主席三鞠躬。此时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们自动转向毛主席遗像的位置，主动、虔诚地进行了三次鞠躬，可没想到这时喇叭里传来了王洪文洪亮的声音：

“一鞠躬！”

附近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阵喧哗，也许是大家情不自禁地都觉得自己刚才的举动太过自觉，不过这个小“骚动”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于是大家按照王洪文的指令“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又一次进行了三鞠躬。

就在我们还等待着“黑雷子”所说的党、政、工、农、兵、学、商和妇女代表的致敬和致哀发言时，王洪文宣布追悼会结束！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毕竟我们不管是在体力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做了追悼会至少要开三个小时的准备，怎么短短的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附近的人群再次出现了“骚动”，也许是不解吧。

在回去的路上，我问“黑雷子”怎么追悼会这样短啊？他信口说：是怕苏修搞突然袭击吧。

回到家后，马上看电视重播，有两个镜头我记忆犹新：一个是王洪文看华国锋的表情怪怪的，好像情不自禁流露出些许不屑来；另一个是江青一袭黑衣，有个工作人员请她坐，她谢绝了，一直肃立着，她这次的表现比她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的表现乖多了，那次她居然没脱帽！

（五）

毛主席追悼会的中心会场随后开放，允许公众在此留影纪念。

我们也成群结伙地去参观，天安门下临时搭的主席台上摆放着毛主席的巨幅黑白画像，有一黑白条幅横跨主席台，上写“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以主席台为背景照了一张像，凡是带了“红宝书”的同学右手持书并放在左胸口，凡是没带“红宝书”的同学则举右手做宣誓状，至少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挺虔诚的。

毛主席走了，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按原先的安排，我们去北京焦化厂学工劳动一个月。北京焦化厂的厂名是朱德题写的，他老人家生前多次来这个厂视察指导过。我们对这个厂也不陌生，因为头年就来过这里一个月，并留有美好印象。

我们也就是在北京焦化厂度过了“四人帮”被粉碎那段难忘而又快乐的时光。1976年的国庆节同以往的庆祝方式不一样。

记得在林彪出事前，国庆节是大游行、大联欢，看彩车，而且要搞多次彩排活动，当时我们小学生只有资格熬夜去看这些浩浩荡荡的彩排，正式的场合我们就被排除在外了。

林彪出事后，庆祝方式也变了。也许是因为毛主席年纪大了，没有体力检阅游行队伍了吧，如果毛主席不参加，其他领导人中谁又敢“僭越”呢？所以此后就变成了领导人同群众游园联欢的庆祝方式。那时最走红的领导人，如“四人帮”，就在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过气的领导人，如朱德，就在颐和园；级别稍低的一些领导人就安排在天坛等公园。比如1973年的国庆节，我就在天坛公园近距离地撞见过邓小平、姬鹏飞，那年邓小平二次复出，但还没火起来。

1976年的国庆节就不同了，为了继续缅怀毛主席，不管是群众，还是领导人，都不敢也不会快乐地过节。老百姓就不用提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则和一些工农兵代表齐聚天安门城楼开了个清淡的茶话会，看起来挺团结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了不少这次茶话会的照片，不同角度的、不同人物组合的都有。

我们对这些照片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包括当时报道的什么地方、什么人给中共中央或江青同志发唁电，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了个通知，说是一要给毛主席修纪念堂，二

要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紧接着两报一刊在1976年10月10日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第一次在报纸上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提法。

这个提法我们注意到了，但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毕竟总得有人主沉浮吧。

（六）

10月11日，中午吃完饭后，“黑雷子”把分布在焦化厂各车间的同学召集到一起开会。他谈到了头天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当他说到“敬爱的华国锋同志”时，不少同学大吃一惊，我和胡林、来小康还交换了一下眼神，觉得这“黑雷子”真能拍马屁，竟然对华国锋也用起了“敬爱”。

要知道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敬爱”只能用于形容毛泽东和林彪，只是在后来，即到了周恩来快不行时，报纸上才很勉强地用了“敬爱”来形容他。我记得对周恩来称呼“敬爱”的第一个场合是在报道康生死后各国各党领导人发来的唁电，当时父亲拿着一张报纸有些激动地告诉我现在对周总理也终于可以称“敬爱”了，我拿过父亲手里的报纸一看，上面果然有“康生同志逝世后以下外国领导人给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发来了唁电：……”的文字。实际上，对周总理的这个“敬爱”还不怎么引人注意。

可“黑雷子”居然对小小的华国锋也用起了“敬爱”！散会后，大家议论纷纷，联想到“黑雷子”此前说的毛主席追悼会至少要开四个小时的“谬论”，都说他讲话太没准头。

就在那天下班后，王水军悄悄告诉我，“江青一伙被抓起来了。”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又是一个反革命谣言！”因为在“四五反革命事件”被平息后，追查过很多个关于江青的反革命谣言。他见我不相信，就说你好好看看那个社论，那说的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我说“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不就是给毛主席修纪念堂，出“五卷”吗？他说你要注意社论中“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个提法，还有关于野心家要失败的说法。

由于王水军的母亲在北京市委工作，我对他的话不敢全不信。回到家后，马上找《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来看，果然发现其中有“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了要失败的”这样一段文字。

带着疑惑，我偷偷地问父亲：“听说江青已经被抓起来了，是真的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革命真难啊！”并叮嘱我“不要乱说。”

回想起“913事件”后，父亲有两个晚上没有回家，他事后说是去到昌平区听李德生关于林彪叛逃的传达报告，他现在的避而不答让我感觉“江青已经被抓”这事是真的。

随后的几天，我们和工人们在一起议论着来自各种渠道的“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直到后来的公开欢庆。

【乱世民情】

那天，我们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干杯

——1976年9月9日的庆贺晚宴

黄晓龙

怦然心动

进入1976年9月，本应是气朗天清的初秋，在这地处大巴山余脉的大竹乡间，却一直晦暗难明，阴晴不定：满天阴霾中只须一阵风掠过，马上就有稀疏的雨点洒下，随后就是红火大太阳。不久、一阵风吹过又扯来满天阴霾……

8号，庙坝赶场，好友余庚邀我次日去潘眼镜那里逛山。潘眼镜是高66届的重庆知青，1969年下乡，由于没有门路，尽管多次被推荐招工，却始终与重庆无缘，只得在新桥小学的戴帽中学以代课谋生。据说学校背后的那匹山深处，风光相当不错，颇值一游。我长期泡在农村，对自然风光早已产生审美疲劳，本无多大兴趣。但余庚一脸神秘地询问：“你注意到没有？老人家很久都没露面了……”顿时令我怦然心动。

几天前，就在重庆和几个朋友私下议论过同一话题。都好几次了，每次都是数月不露面，每次都以为那个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翔的老人马上就要去“见马克思”时，却突然又是接见外宾，又是“最新指示”和“已阅：照办”的批示。

不得不令人直犯嘀咕；难道真像前几年那个搞笑的“特大喜讯”所言；要一直活到一百五十岁？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永垂不朽”？尽管在报上的照片和新闻电影里，那人已经衰老得要左右搀扶才能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于是我们兴致勃勃地约定；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去搞鱼请客。他买酒。买好酒，大家举杯庆贺。

对那一天、我们渴望已久。我们都清楚，不仅我们个人的命运，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机，都唯有在那个老人死后才有可能。

我认识余庚已两年多。最初的他在我眼里，仅是华而不实的纨绔子弟一个。但交往日久了解加深，竟成了我在庙坝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尽管我们经常争得青筋暴露，甚至几天都互不理睬。尽管区里上至领导下至几大员（诸如农技、水利、林业员）都曾经多次向我暗示；余庚的问题很多、思想反动，最好离他远点，以免受牵连云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我当年在渔场又何尝不是如此？更何况我们有那么多的“臭味相投”，有那么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还都长有不甘逆来顺受的“反骨”。

他自小就在孙伏园，老舍等大师学者影响所及的文化圈内长大，耳濡目染造就了他远远高出其他人之上的目光和胸襟。虽然十三四岁时就因其父的黄埔身份，全家从北京被赶到其母在大竹庙坝的老家。虽然他在庙坝中学任教的母亲工资几与县委书记持平，但他却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挣表现。也正因为有他出身黄埔、长期担任孙伏园秘书的父亲一直守在他身边，言传身教地引导矫正着他的成长。在很多问题上，他的分析和判断才始终高出我一筹。对世态人情远比我清醒敏锐。比如；对区和公社那几个头头，他一针见血：“你别看他们走到哪里都是恭维和尊敬，其实人们是敬重他们手上的权力。”令我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新桥公社小学背后那一匹山确实称得上风景独好。一条砂石小路蜿蜒在稻田、竹林和果园之间，尽管时断时续地下着小雨，但人迹罕至长着稀疏野草的沙质路面却没有一点溜滑的感觉。我和余庚、潘眼镜、余竹生，一路嘻嘻哈哈相互打趣，享受着仿佛世外般的宁静缓缓登山。

正当心旷神怡，余庚突然用紧张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轻轻喊了一声：“听！你们听到没有，在放哀乐！听到没有？！”

一行四人全都停住脚步，凝神静听；天呐，果然是哀乐！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难道老人家真的死了？那一刻真的来了？

哀乐在远处时隐时现但却是真真切切地响着，后面肯定就是讣告。到底是不是他？……

没有任何人招呼，四个人都转身向来路狂奔。

转过一道垭口，哀乐顿时清晰起来，紧接着一个凝重低沉的男低音响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伟大的领袖……”

雨停了，阴沉沉的天空竟然奇迹般地有一道阳光穿过云缝，宛若一道金色的飞瀑自高天倾泻而下。

未来路在何方

没有一个人说话，甚至没人动一下，当讣告结束哀乐重新响起，在一派静寂中，唯有前后不一的长长吁气声。

余庚用带有明显的京味川话开始抒情：“啊！一个以毛泽东命名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一向谨言慎行的眼镜潘传学慢吞吞跟上：“七一年、永远健康变成了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七六年、万寿无疆变成了永垂不朽，精彩！”余竹生又接着：“朱毛、朱毛，朱德死了毛也不长！”显然是来自大竹市井的民间说法。

余竹生是老八路、大竹粮食局长的公子，早在文革初始，我们渔场百余名知青在县社教工作团静坐请愿，一度被上千“革命群众”围困时，是他带着一帮红卫兵和那些“革命群众”辩论，才让我们解除了围困。自去年起，他又成了余庚的“粉丝”和铁杆兄弟。显然、他是昨天下午从县城直接赶到余庚家里的。

一路兴高采烈中，潘眼镜慢吞吞挑起了话头：“你们看，今后中国是母系的武则天时代，还是华国锋时代？”

“当然是相似于赫鲁晓夫式的邓小平时代，其实当年如果不是老头子要取代世界革命的领袖地位，可能我们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立即不假思索地回应。当年的赫鲁晓夫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敢于直面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敢于为冤狱平反，敢于提出和平竞争，令我一直暗中崇敬艳羡不已。

余庚立即反驳：“不对，应该走美国道路。”

我除了通过德莱塞、杰克·伦敦的小说对上世纪和本世纪初的美国有粗浅的

感性认识外，深入骨髓的唯有小学时就被灌输的那一套：美国底层黑人连黑面包都吃不饱，经济危机时农场主宁愿将成吨的牛奶倒进河里也不愿低价卖给饥饿的穷人，大亨的一支雪茄烟相当于底层百姓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美国总统的全国竞选不过是利益财团之间的博弈而已……

正当我们这一帮草芥小民徒劳地为国家前途、民族出路争得剑拔弩张、寸步不让时。余庚又像往常那样挂起了免战牌：“哎哎，你昨天不是说要请我们吃鱼吗？还争啥子？该兑现了。我们都在等着今晚上吃你的鱼呢！”

是呀、高家渔场的老王老张前天就已经在新桥下游的河段打鱼，他们新近买了一只水獭，这时肯定已捕获颇丰，去晚了一步就可能被人买走。于是、由潘眼镜带路，我一路意气风发地朗诵着“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向新桥小学奔去。

干杯声中徘徊于门外的阴影

当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驮着一条草鱼一条鲤鱼，按事先约定直接赶到庙坝餐厅时，余竹生一脸兴奋地告诉我，张源忠正在从县城到庙坝的途中，不久就会到。张源忠是将电话直接打到庙坝邮局找我（当时凡朋友找我，我都叫他们直接打到庙坝邮局由小雷转告），恰好他们正在邮局和小雷吹牛，余庚即热情邀他来庙坝喝酒讲故事。

资本家出身（实际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张源忠，小学毕业后一心向往探险旅游，1964 年仅 13 岁时，听说可以下乡到山区，竟天真地以为下乡后就可以在深山老林里探险，于是报名当了知青。当他在林场生活数月，浪漫幻想尽失之后，已无计可施。好在他一表人才高大魁梧，对表演艺术悟性极高。1969 年就已在大竹备受瞩目，1971 年被招进大竹铁厂，经常参加文艺宣传演出。数次代表大竹县参加地区甚至省里的故事会汇演。他一直想回到家乡重庆，但在当时没有任何希望。显然，张源忠也是因为听到老头子去世的消息后有一肚皮的感慨想倾吐发泄。

由于来回近十公里，全身湿透，当我回到区委宿舍换衣服时，恰遇区委文书老陈和区财粮吴华林在发黑纱。于是，衣袖上戴着悼念黑纱，我兴高采烈地坐到了庆贺老头子去世、庆贺濒临绝境的中国人迎来转机的酒桌前。我相信、就在那

一天，应该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宴在私下举行。

张源忠很快就从县城赶到。为了助兴，我们邀他讲起文革初期，他那不逊于艾芜《南行记》的传奇经历：年仅 15 岁的他趁大串联之机，满怀少年人想当然的浪漫天真和激情，准备去西双版纳和大理蝴蝶泉一带圆探险梦，不料刚到保山就被当成偷渡犯关进了收容所，经保山、蒙自、昆明和重庆的收容所一路辗转，被遣返回大竹。在几个收容所接触了解过上至逃亡右派和大学生，下至小偷乞丐妓女的各色人等。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不幸与徒劳的抗争，直至形象、举止特征、收容所的环境氛围，都在张源忠惟妙惟肖的模仿描绘下，不断引来阵阵笑声。连在厨房做菜的邓友伦、邓宜金两个师傅也几次放下手上的活计，跑到厨房门前细听。每到精彩处也随同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晚餐相当丰富，除了糖醋鱼，炒鱼片、豆瓣鱼外，还有锅巴肉片、蘑菇肉片，丸子汤，摆了一大桌，余庚果真从挎包里掏出了一瓶显然早已备好的泸州老窖、一瓶庙坝酒厂搞来的原度酒，逐一在我们五个人的碗里斟上。连从来都是滴酒不沾的我面前也被他倒上了浅浅一汪。

随即余庚一脸庄重地举着碗站起来：“来，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干杯！”

“干了！”“干了！”五个人一起响应，我也抿了一口。趁大家还没有坐下，我又提议：“为命运转机的到来。为天下每一个人的未来祝福，再干！”那一口我喝得有点猛，一口下去，一股热流顿时冲上额顶。真痛快！

一边吃菜喝酒，一边趁着酒兴感叹起命运的不公。话题很快转到当前的种种可能、机会和危险。上午的话题和争论才刚刚展开；餐厅负责人邓友伦神色慌张地从门外走来，用从来没有过的严厉打断我们：“老黄、小声点！张特派已在外面转了好几圈了！刚才还问我你们在摆些什么。我说是你们县里来了一个朋友，正在请他讲故事吃饭，他才没有进来。这阵还在门外转，他后面还跟着两个中心大队的民兵。”

在顿时升起的一片凝重中，我颇不以为然：老头子死了，难道就严禁喝酒吃饭，不准朋友往来？至少中央还没有明确规定。我和张特派的宿舍仅隔着一个天井，就在斜对门。不管在哪里、他一见我每次都一口一个小龙地亲热招呼。还经常邀请我去他的宿舍兼办公室坐，看报、吹牛。我不相信他会对我下手。正当我站起来，准备也将张特派拉进来喝一杯时，却被余庚一把紧紧抓住：“别去，这

那个时候他眼睛早就红了，你们肯定会吵起来，会被抓住把柄……”随即低声招呼大家不喝酒了，赶快吃饭，完了再请张源忠讲故事。张源忠随即痛快地将酒一口喝干，十分过瘾地揩着嘴角说：“好，我讲《流浪者》，要不要得？”

《流浪者》开讲不久，电灯就熄了（那时庙坝的所有用电，都靠一个建在小溪河上的水电站供给，由于水坝低水拦储量小，每晚只供电到10点正）。邓友伦又拿来几支蜡烛点燃，我们几人连同餐厅厨师邓友伦，邓宜金还有欧妹余妹两个服务员，在摇曳的烛光下如醉如痴地听完故事后，已经是11点半了。

安排好张源忠的住宿，送走余庚一行后回到区委。刚刚打开宿舍门锁，吴桦林就脚跟脚走进我宿舍。一脸关切地小声问：“小龙，你晓不晓得，你们今晚喝酒，张特派向李书记和马书记汇报了好几次？”

见我一脸的酒兴和不在乎，他又满怀忧虑地叮嘱：“这是个敏感时期，要注意一点。”

我则一脸兴奋地对他耳语：“正因为敏感，才值得庆贺。”吴桦林随即也微笑着耳语回应：“同理。但小心为妙！”

吴桦林的父母都是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父亲1957年成了右派，在音乐系任教的母亲前不久还来庙坝悄无声息住过好几天。他1958年考进达县大学。1961年以大专学历毕业后就一直在庙坝当财粮委员。为人善良循规蹈矩，但也非常清醒，我们曾有过好几次打哑谜式点到为止的交流，可谓人同此心。八十年代初他被提拔为副县长，后官至县长、人大主任。据说官声不错。他命运的转机，应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那一夜我睡得很香，很沉。

母亲突然到来

第二天刚刚天亮，被区委陈文书乒乒乓乓的打门声吵醒：“小龙，天都亮了，还在睡懒觉。还不快点起来。你兄弟刚才来电话，说你妈今天从重庆来，叫你中午去车站接。”

我一骨碌翻起来，心中大惑：“在这个时候来，莫非家里出了什么事？”长期生活在恐怖和高压之下，一听到意料之外的消息，就会出自本能地往不祥的方向推测。

还来不及想定，陈文书就已推门进来，有意脸朝外地大声说：“还在睡懒觉，该起来了！”然后转脸压低声音，几乎是咬牙切齿道：“昨晚上你们喝酒喝得好呀，张特派来找了李书记好几趟，你小心点！”然后放大声音：“这朵白花，拿好，10点开悼念会。”随后关门离开。

悼念大会隆重肃穆，有不少人在抹眼泪或隐隐低泣，但似乎表演做戏的成分居多。趁默哀三分钟，我偷偷抬眼四顾，张特派就和我同站一排，只隔着三个人，此时他也侧头偷偷向我瞟过来，与我目光相撞后又急忙闪开。看来此人肯定心头有鬼。昨晚邓友伦的恐慌，吴和陈的警告绝非多虑。

终于在午后接到了风尘仆仆的母亲，她还同时带来了么舅的儿子，年仅5岁的小表弟郭晴。原来、几天前在重庆家里，和三弟小平谈起老头子可能不久人世，谈起一旦老头子死后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时，我无意间愤愤不平地说起：如果江青那一帮真的上台，一旦有人振臂一呼，老子绝对翻船（当时重庆一带流行俚语，意即捣乱造反），“一年到头提心吊胆的苟活，不如干一场，即使死了也死得像个人！”……一席话令一家人忧心不已。昨天一听毛老头死了，小平马上从厂里赶回家，连夜和小渝、小鹤、母亲商量，一致决定让母亲带上郭晴到庙坝将我守住，不准轻举妄动。否则又将是一人遭殃全家倒霉。

原来如此。放下心来的同时，我既感动又好笑，我有那么盲目、那么蠢吗？不是江青还没有上台吗？

就在当天晚上，母亲严肃地告诉我，区委李书记下午曾经来坐过一阵，悄悄要她转告我，一定要少和余庚来往，区里对余印象不好云云。但并没有提及昨晚的事（不然母亲滔滔不绝的责难和唠叨，肯定会念得我要发疯），又令我好一阵感动庆幸。但也为他对余庚的偏见颇感悲哀。

那时、我并不知道，在张特派三番五次急不可待，逼宫式的请示汇报前，正因为李书记的巧妙应对，才使我们几人避免了一场无妄之灾。据说当时、李芳盛书记和马先河副书记自始至终在商讨着第二天召开悼念会的相关事宜，对张特派的请示似乎一直无暇他顾。始终不予理睬。我们才有惊无险地有了一个完整的欢庆晚宴和痛快尽兴的记忆。——这些都是我在后来才从陈文书那里得知的。

但对那晚的凶险程度，我直到1978年5月才有了真正的了解。那年5月我带学生分别在大竹几个渔场实习。街头偶遇原水产站同事陈良忠，他一把拉住我

到背静处，满脸惊喜地对我说：“好哇，小龙你那年跑脱了，都没有给我说一声，今天该你请客。”原来他昨天在周家区的公安特派员那里耍时，无意间看到了1976年5月由大竹县公安局印发的《敌情通报》，上面赫然印着：水产站技术员黄小龙，于3月水产站开会之际，散布攻击中央首长的政治谣言，被召回农业局接受公安局讯问时逃离等等。联想到张特派不顾热脸遭遇冷屁股的尴尬，三番五次请示领导要求抓人……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张特派早就根据那份《敌情通报》做出了判断。那时只要李芳盛或马先河两位书记微微点一点头，我们几个人的命运肯定都会有另一番坎坷。

至今我对当年的李、马两位书记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激和敬意。那是一种基于良知和勇气的担当。是一种不动声色之间的睿智和大勇。可惜马书记早在80年代就因病去世。90年代中期，李芳盛书记在县老干局局长任上时，我几次到大竹都去老干局找过他，每次都恰逢他外出或正在开会而始终未能一晤。这些年每每念及，总对他们怀有一种深深的愧疚。

命运的转机从那天开始

不久、“四人帮”倒台，全家人、周围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舒展的笑容。记得那段时间，天天晴好，暖暖的、明亮的秋阳仿佛照彻了心里。

1977年3月，我被调往刚由农校升级为达县农学院的水产系任教。

也是因为有了那一天，早过了而立之年却一直不敢恋爱成家的我，终于有了我的另一半。1980年5月，在我调回重庆前夕，年近37岁的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有了正常的人的生活。尽管我在梦寐以求的文学领域内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我独立主持的两项市级水产科技项目，都获得了全国知名专家“居国内领先水平”的高度评价。这在1976年9月9日之前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

一直处于逆境的余庚，1978年考进了省英语师资班，毕业后即任庙坝中学外语教师，随即又与一位贤淑大气深明大义的重庆女大学生结成伉俪。他的父亲也恢复工作，一连三届出任大竹县政协副主席，其学问人品一直受到大竹各届人士的敬重。余庚不幸因肝硬化于2007年辞世于重庆渝北区。这些年，每当想起我和他在庙坝漫步于公路上，一路争执得脸红耳赤的往事，想起他的语出惊人、他的敏锐，总是有一阵深深的痛惜。如果他晚出生十几年，如果他生活在另一种

社会文化环境，如果他的锋芒内敛一点、只要那么一点点，他肯定能有很大的作为。

眼镜潘传学，后来当上了校长，出版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在县计生委副主任任上退休后回到重庆，据说已是时下颇为走红的网络作家。

张源忠在那之后不久，即与邻水知青曾丽君结为伉俪，调入邻水医药公司后不久就写出儿童电影剧本《清亮的小溪》，由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摄制后在全国放映。不久他也调回重庆南岸区文化馆。

早在 80 年代，余竹生即赴深圳创业，据说在 90 年代中期就已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还有那个善良精明的厨师邓友伦，在 1990 年初就已经是大竹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老板。他的儿子当时已考进了清华大学。

无论如何，1976 年 9 月 9 日都是一个值得纪念值得庆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那一天是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拐点。那个一直操控着中国最高权柄的老人在那一天离世，才使中国人有了希望，有了转机。

但这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哀：十亿人（其中不乏清醒、睿智、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的命运，竟要在固执而颀顽的老人死去之后，才有权自己选择！尽管这十亿人那些年天天都在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尽管这个老人一直都在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之类“最高指示”教导着他的子民……

【文革文化研究】

按：徐贲此文原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与公民认同》一书的第十六章。此书 2009 年由新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里刊登的是未经删节的版本。此文原有 18 个中英文注释，这些注释很有学术性，但因文字较多且中英杂陈，本刊难以改成文中注而不得不忍疼割爱。需要这些注释的读者，请知达本刊，以便另发。

[文革中的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徐 贲

在物欲横流、贫富悬殊、官贪政贿的今天，一些人开始把文革时期当作一个与当今社会反衬的时代来怀念。在这种怀念中，文革被想象为一个与当今“物质主义”截然相异的理想时代。有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物质虽然匮乏，但却是一个物质分配公正的社会。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许会按照自己当时不同的经验和现在不同的处境形成不同的看法。不曾有过这种生活经验的人则更是可以凭自己的偏好和需要去作自由发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反思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最好不要光凭个人经验或印象，而是应从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入手。了解了物质文化的基本结构，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文革时期物质文化的特点。

物质在文革期间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其实是极其重要的。文革的所谓精神世界秩序正是由物质来体现、维持和再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人注重物质，一点也不比现在的人逊色。仅仅着眼于文革时期人们可以实际支配的物品，便无法认识文革期间的那种极端的物质主义。和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一样，文革时期的物品所满足的并不是人的所谓普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由当时社会和政治文化所理解为“正当”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如何形成的？它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国家以何种正义原则和为何种目的去满足这些需要？今天，这些原则和目的是否还具有正当性？这些恐怕才是我们探讨文革时期物质分配问题的关键所在。

“物质文化”所说的物质不是指大千世界中的自然物质，而是指与人们社会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物品。消费物品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有用）和商业价值（值钱），而且更具有载负和传递文化价值（意义）的作用。消费物品的文化意义存在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而且还与三个层次间的意义转换和流动相关。我们可以把消费物品的三个不同意义层次分别称作为“文化社会”、“消费物品”和“个人消费者”。

第一个是由文化构成的整体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世界或社会。具体的文化世界与外界社会联系可大可小，因此，其体系的严密性也各有差异。文革中的中国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化世界。它极其封闭，也极其严密，严格地限制着物品在其中可以起的作用。

第二是物品本身。物品是它所载负和传递的意义的符号。文革期间物品意义一般都具有政治意义，而一些物品又特别具有政治意义或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因而成为当时和今天都特别标志文革的符号。

第三是消费者个人，他是具体物品意义的自由阐释者。在文革中，个人的自由程度受到极大的限制，他对物品意义的运用也受到极大限制。

在这三个意义层次之间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流动形式。第一种发生在文化社会和消费物品之间，它使得某些物品特别具有符号意义或者成为特殊的符号。第二种意义流动形式发生在消费物品和消费者个人之间，它使得消费行为成为某种“仪式”，也就是成为人与人关系中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表示”、“表现”或“表演”。

对上述问题，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讨论：一、从文化社会到物品的文化价值和“时尚”作用；二、联系物品和消费者的“仪式”行为；三、文革时期的“分配正义”问题。

一.从文化世界到物品

对物品来说，最基本的意义层次就是社会这个由文化所构成的世界。人们在这个文化性的世界中感知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情发生，并把握它们的意义。这个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如何去看待和理解其中的事情和事物。人们从他们现有的文化获得认识世界的基本认识范畴和基本价值。基本的认识范畴给了他们关于“时间”、“地点”、“人群类属”等等的概念，而基本的价值则使他们得以分辨“好坏”、“善恶”、“优劣”等等。

感知世界的基本概念和价值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被实体化的。文化世界决定人们具体可以做什么，做什么以后会有怎样的具体后果。它也决定人的行为对这个世界会有什么作用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在这个文化世界中做的事情又都是在复制和再生产这个文化世界。

物品是人们日常生活将文化观念实体化为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物品的生产、使用、消费和交换使得文化世界的基本认知概念变得十分具体、实在。物品的实际存在起着构筑文化世界的作用。物品是文化意义的极重要、极明显的记录。考古发掘正是这样从残存物品寻找过去文化世界的痕迹的。在生活世界中，

观念更是必须通过具体的物品才能获得具体的表现。可以毫不过分地说，物品是抽象观念的“现实表演”。

说物品是文化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单单是说物品在社会文化中构成了一个符号系统，而且是要强调，物品的符号意义本身就是由来自社会的正当性理由所支撑的。就在我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物品的时候，社会秩序变成了一种必然的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是在物品的使用中被巩固和被再生的。单单从符号表意系统来看一件物品，它的意义存在于它和它的同类物品的差别。例如一件军装之所以为军装并不是因为它必须穿在军人身上，它之所以为军装是因为它不是工作服，不是西装，不是长衫等等。但物品的纯符号意义并不等于它的社会意义。一件物品之所以获得某种社会意义是因为它和外在于这个符号系统的某些社会概念或价值联系在了一起。例如，一件军装在文革的中国有“革命”的符号意义（鲍德里亚称之为 *alibi*，即托词），这是军装在许多其它社会中没有的意义。对于这件军装来说，“革命”才是穿它的正当理由。

在不同社会（即文化世界）里，起主导作用的正当理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大多数社会里，与物品有关的普遍正当理由是“需要”、“用途”、“作用”等等。例如，表现高贵身份的貂皮大衣可以因“很保暖”来获得正当性，成为一件满足人们“自然需要”的物品。在文革中，物品的普通正当理由（如“满足生活需要”）之上更有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这种更高的正当理由就是“革命”和“无产阶级”事业。因此，最具正当理由的便是“革命需要”、“革命用途”、“革命作用”等等。

物品在文革中具有极强烈、极明显的表演功能。这种表演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夸示和联想。夸示性表演往往需要借助文字和图画来表现，而联想性表演则更侧重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正当需要观念。因此，虽然联想性表演不如夸示性表演那么显见，但它在更深的层次上让我们看到，当人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它的时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这些意义的社会规定再生这个社会秩序。例如，文革时的住房外都写着革命标语，画着毛主席的画像，这便是夸示性表演。当时的住房极其紧张，仅有的少数新造住房也是十分粗陋。但是，比起那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考究住宅（西式的或中式的）来，粗陋的住房却有远为优越的联想意义（艰苦朴素）。那些不具此联想意义，或具有相反联想意义的西式洋房，无论画上多少毛头像，写上多少革命标语，都不可能在联想层次上具有与粗陋房舍同样

的表演效果。在文革期间，朴素和考究的关系不只是彼此不同，而更是有此无彼。使用朴素物品成为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唯一方式。一切明显的考究、精致物品都会立即被联想到奢侈和资产阶级。这类物品会给使用者招惹许多麻烦，尤其是当使用者本人已经被归入政治上不可靠的属类。

在文革物品的使用中，权位越高者越不受物品的这两种表演性限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照样可以住在中南海或高级住宅区，照样可以看外国电影，读“封、资、修”的书籍，等等。文革物品对“艰苦朴素才革命”的表演是为一般普通人设计的，其作用是将他们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变为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般人，“越穷越革命”成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合乎道德理想的社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制人们接受的，而是由每个普通人在他的日常物品使用中自然形成。社会机制不断按自己的模式再生，并将社会机制强化为一种道德秩序，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人们在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过程中，形成与之相一致的价值观念。

在文革的物品世界中，并不是所有的物品都具有相等的夸示性和联想表演功能。不同物品结合这两种表演性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像上面提到的住房，它的两种表演性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大多数物品也都是这种情况。这些物品中许多并没有很明显的联想表演性，如儿童使用的文具盒、簿本，大人使用的脸盆、毛巾、饭盒等等。这些物品往往只能靠革命图像和文字的夸示表演来凸现它们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物品的夸示性表演还表现在它们的品牌名称上，如“红星”、“红波”、“卫东”、“东风”等等，甚至出售它们的商店名称上，如“五七杂货店”、“红卫文具店”、“长征药店”等等。还有一些物品，它的暗示性意义与革命夸示表演根本就是冲突的，因为它们本身就带有坏的联想意义，如金银首饰、西洋服装、宗教用品、古董字画等等。这些物品因此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谁若用它们去展示革命的图画和文字，那就会被看成居心不良，诬蔑革命。再有一种物品，它们的正面暗示性极强，几乎不需要夸示性表演就能展现极强的革命意义，如军装、毛像章、语录、枪等等。

物质的表演功能是和等级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越值得公开演示的，也就是社会价值高的，越是高等级身份者所“自然”拥有的。程文超在论及文革中的“军用品”时这样写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军用品的。那么，你是军人

家属，那自然是光荣的，有一些军用品用，也理所当然。但那年月，并非军人家属、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或者说，那年月，能用上军用品，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征。解放鞋，将你和穿一般球鞋的人区别了开来，它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背景等鞋之外的很多意义。因而在那时，‘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程文超还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他当知青时农村运动多，一有运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一次运动又来了，队领导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领导们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人说是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让他躲过这一劫，”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时的坏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是不可能穿上解放鞋的。而穿上解放鞋的，就不可能是坏人。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怕是很难理解，鞋里，还能藏着这样的政治玄机！”（程文超《波鞋与流行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文化研究》2002年第三期，第240页）

文革中，可以表演“革命”身份的物品成为一种时尚，时尚是物品的一种象征作用，它的产生和流行离不开广告的宣传。文革时尚和广告有它自己的特征。一般现代社会中的物品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往往通过两种途径，广告和时尚，巴尔特将之称作为大众文化制造的“神话”。时尚把物品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美丽、尊贵、地位等等）转化为物品的自然属性。例如法国香水夏奈尔5号可以变为高贵、典雅和美丽的化身。时尚的反面还有逆反时尚。时尚引导者往往是社会上层名流，他们喜爱的物品成为他们优越地位、丰厚收入和高雅趣味的象征。逆反时尚引导者则多为社会边缘群体人物，如嬉皮士、朋克、同性恋者等等。他们的文化因激进、新奇和反叛而变成一种另类时尚。

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有同也有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文革物品，如军装、工装、毛像章，它们的象征意义化过程是一个时尚化过程。它的始作俑者在类别上与一般社会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极具特色。文革中，起广告作用的是报刊媒体的革命宣传、样板戏和许多“重要事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亲自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成为时尚最高的引导者。毛也同时代表边缘身份的造反派和老大粗，成为逆反时尚的领导者。

文革时尚和一般社会时尚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一般时尚的诱导手段之外，文革时尚还加上了暴力和恐怖手段。一般时尚，如到麦当劳吃快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吃还是不吃。但文革时尚是不允许这种选择的。它体现的是绝对的强制性。文革时尚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违背时尚者的严厉惩罚。“破四旧”、“抄家”和许多斗争会就是以使用错误物品为罪证来采取暴力行动的。即使是不小心误用，无心之过也可能给人带来牢狱之灾，如把小红书放错了地方，不当使用了印有毛像的报纸，吃了猫肉等等。时尚物品的使用更被用作区分“自己人”和“敌人”的工具。关在牛棚里的人是不能穿军装的。识别一些时尚物品的“内部”差别（如军衣的四兜和二兜的差别）更是能让时尚者感到了自己是“内行人”的心理满足。（这和能闻出夏奈尔 5 号和认出 LV 提包是一样的。）

文革时尚和一般时尚的另一个区别是革命时尚直接与统治权力挂钩。研究一般物品意义和一般时尚者大都指出物品使用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无须统治权力直接介入就能维持的秩序，故常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一般社会中是统治的无形之手。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用于文革中的中国。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是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和恐惧手段加以贯彻的。这是极权意识形态的特征。文革中的极权意识形态设计并构建了当时的文化世界。物品成为这个文化世界最明显、最日常生活化的反映和记录，也成为专制国家政权暴虐统治的直接工具。

人们追求的往往并不是物品本身，而是可以用物品为手段来达到的某种目的，尤其是人生安全感。这里面有一个两步的过程。第一步是从物品到某种可见的社会身份品质。例如，从贵重物品到“富有”，从优雅物品到“学问”或“品味”。第二步则是从社会身份品质到人生便利，尤其是人生安全感。文革和一般社会的区别在第一步，不在第二步。一般社会中，物品起到区别社会等级作用主要是通过物品与金钱的关系，物品越贵重，使用者的身份越高。具有追求价值的物品（时尚物品往往是这一类物品）所寓寄的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品质包括财富、地位、荣耀、学识、美貌等等。文革中的时尚物品似乎与一般社会的完全不同，因为文革中许多一般的贵重物品（金银、古董、高级衣物）具有负面联想意义，成为人们急欲躲避（至少是不敢公然追求）的物品。但这种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文革时期，人们追求的最终也是人生的安全感。文革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享有

这种人生安全感。这才是文革社会等级极大差别的关键所在。

在一般社会中，生活中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东西包括财富、显贵出身、名声、学问、教养。一个人有了这些，就能获得人生安全感（不受侵害、满足日常需要、尊严、自由、随心所欲、对未来有信心等等）。人们追求人生安全感，这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那些可以获得人生安全感的東西。文革时，当财富、学问、某些地位和声名不再能带来这些人生安全感，反而危害了这种安全感，它们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们所向往的对象。相反，一般社会中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品质（贫穷、愚昧、没教养、卑微出身等等）反倒成为获得人生方便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物品使用公开追求这些“下贱”品质，这未必真的就等于人们已经在心里彻底厌弃以往的“高贵品质”。尊卑的表面颠倒使得文革时期的物品使用比一般社会中更具一种特殊的表演性、假面性和矛盾两重性。文革中，参加抄家的人侵吞抄家物资，只敢私藏，不敢显露，就是矛盾两重性的体现。

文革社会看来颠倒了一般社会的等级标准，使得原先的优等阶级变成了劣等阶级，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等级标准并未发生变化。文革社会和其它任何社会一样，谁享有人生安全感，谁就是优等阶级。在一般社会中，最能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金钱的人，因为金钱是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交换手段。在文革中，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暴力权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社会利益。文革中最具正面符号价值的正是一些与暴力权力有关的物品，军装、印有最高统帅头像的物件、代表他的思想和意志的书籍等等。军事组织既是暴力机器，又是暴力价值的象征。文革中社会军事化，与当时文化世界范畴和价值的敌我二分对立化是同时发生的。军事禁欲主义和当时的物质极端匮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革时期特殊的物质价值秩序。

二.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

从文化世界到社会等级身份标志物品，其间的意义流动是一个时尚化的过程。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其间的意义流动则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仪式”指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故亦可称作为“象征行为”。通过仪式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社会行为，人们在相互的交际中应用、挪用或者甚至修改物品的意义。

人们在使用仪式化物品的过程中维持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形式关系。因此，仪式化的物品使用总是在维持某种社会秩序，并使得本来抽象的社会秩序通过物品使用明白地显现出来。最常见的仪式化物品使用包括送礼、宴请、炫耀（展现自己的所有物）、节日或婚嫁、庆典等等。

在仪式化消费行为中，物品成为“交际物品”（communicators），物品的流动往往起到标志和巩固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关系的作用。长期研究消费文化的学者斯莱特（D. Slater）指出，“作为交际物品，物品首先是表示社会关系和区分的‘标志’。通过物品的公共意义和公开使用，消费使得（抽象的）区分、类别和等级变得清楚可见，因而组成了社会秩序。（物品的）社会意义一般是变化而不稳定的，消费仪式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物品使用方法，消费仪式将物品的社会意义固定下来，并给它们以‘可见的社会定义’。”斯莱特以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仪式化物品消费。圣诞节吃火鸡，火鸡成为群体标志（信基督教的人），时间周期标志（一年一度），亲朋家人标志（宴席出席者）。作为圣诞大餐的主餐，火鸡还成为上菜的程序和最尊出席者（分割火鸡者）的标志。仪式化的物品消费具有做给人看的公开展示性，因此特别起到组合社会关系的作用。可以说，通过仪式化的消费，人们才得以构建和维持了一个可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

我们不妨用文革期间的“赠送”和“占有”这两种仪式行为为例子，来看一看物品消费与当时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公开赠送主要表现为“嘉奖”和“福利”。单位对“先进”个人送毛选、奖状、笔记本等等，但不送“红包”，这标志着重精神，轻物质。但另外一方面，过年过节又会给职工送毛巾、肥皂、劳保用品、食堂配菜，以标志领导和组织关怀。赠送实物而不赠送金钱，看起来相似，但却有重要的区别。发实物是自上而下地设想和规定人们的需要。发什么物品，发多少，都是“组织”的事。组织给你什么，你就需要什么，给多少，你就需要到什么程度。人跟人的需要是一律规定的。发金钱则不同，那是允许人们自由设定需要，决定不同需要的主次并决定将这些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每个人领到同额的奖金，根据自己需要购买的物品肯定不会一样。文革中常有发的用不掉，不发的用不到的情形。尽管发钱比什么都好，但一发钱就是错误的“物质刺激”和“金钱挂帅”。赠送和需要的脱节使得赠送成为一种纯形式的，表示上级关怀的仪式。它表示上级父母般关怀的作用大于满足群众实际需要的作用。

文革期间，金钱的作用还受到票证分配物品制度的限制。文革中托人办事，每每请客吃饭、送礼，但不送钱。送钱是明目张胆地贿赂，一旦抖露出来，钱便是罪证。实物与请客吃饭不同，那是“人情难却”，所以往往是半公开的。请客送礼一般限于食品和烟酒，当时这类礼品的实际价值比现在要高，因为都是定量供应的，就是有了钱也未必买得到。请客送礼是一种非冠冕堂皇的半公开行为，它是对所请所送的人表示尊敬、表示亲近的仪式。太生疏的关系是送不上礼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转托他人。受礼的当然是有权势地位、有能力替人办得成事的。和单位“赠发”物品一样，托人办事的请客送礼是一种增进社会关系或人际“亲近感”的方式。由于这种亲近感，社会中实际存在的权力差别在一种类似家庭的关系中变得容易接受了。人们尽管没有选择的自由，尽管不得把自己的那一份定额物品“赠与”有权有势的人，但毕竟换取了照顾和关照。文革期间的整个社会秩序就是营造在这样一种类似家庭的父权统治模式上。只要你听话，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安排，威严但慈爱的父亲（领袖、党、国家、领导等等）自然会照顾你的。

文革物品使用还表现在仪式性消费的另一重要形式，“占有”。消费者对物品的占有不仅仅是指花钱购得物品。它更体现为用物品建立一种特殊的“私人感情”关系，如在新书上盖上藏书印，对住房进行装修，将收藏品展现给别人以示炫耀，等等。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在文革中往往不再有效。文革中抄家、破四旧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被别人知道家里藏着“好东西”的人家，所以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恰恰成为文革时期的大忌讳。文革中，人们有很强的分辨意识，知道哪些是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正确意识形态联想意义），哪些是不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反动”意识形态联想意义）。这是当时物品使用的占有仪式的基本条件。在区分亲疏人际关系上，占有仪式比送礼仪式来得更重要。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往往是可以给家里的亲人或极好的朋友看的。文革时传借“禁书”就是在极当心的小范围内的占有仪式行为。

去占有是仪式化占有的一部分，或者说，仪式化的占有包括仪式化的去占有。文革中有一些特殊的“去占有”仪式，如将祖传的文物或住房“捐献”给国家，自破四旧，烧毁旧照片和保存多年的物件，或者刻意穿着朴素，以及其它种种避免“露财”的做法。“去占有”是一种公开表演，表现原占有者与自己过去群体

或者本人的一部分“划清界线”。去占有成为一种对个人记忆和经历的自我否定。在一般社会中，人们会尽量通过占有来保存个人记忆和经历记录，因为物品的情感价值本身就是占有的一个目的。人们珍视旧宅、旧物件、收藏和旧照片等等，并非是因为它们有经济价值或使用价值，而更多的是因为有记忆和情感价值。强迫人抛弃旧物是极具伤害性的。文革以后，许多人痛感家庭或个人记忆失落，很多是因为被强迫放弃占有旧物的缘故。社会群体也有类似的集体去占有遭遇。历史纪念物或建筑可以说是集体性的占有物品，它们在文革中遭到的破坏，其实也是一种集体性去占有的结果。今天的普遍怀旧情绪，包括恢复这些建筑，则是再一次占有的占有仪式行为。

文革中不同形式的占有是社会等级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人享有物品必须先占有物品，而有特权的人则不必占有物品就能享用物品。因此，身份的高低并不全在于实际占有物品的多寡，而在于虽不直接占有就能享用物品。这种不占有就能享有才是一种高等的“拥有”。文革中常见的一种占有仪式就是婚嫁喜庆，常常是被褥、家具、日常用品的公开展示，以示家庭的“好条件”。这就是一般人的占有，他们所占有的就是他们所享有的，他们不能享有他们所不占有的。这样的占有仪式往往被人们视为“俗气”。这不只是一个品味的问题，布迪厄的文化理论分析早已显示，品味的差别其实就是社会等级的差别。真正有“身份”的人不需要展示他们的占有就能让人明白到他们的享有，他们有“公家”“分配”的住房、汽车、家具、服务员、警卫员。这一切都是与官职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哪一天失去了官职，所有“待遇”立即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官职权力成为社会等级的根本标准。而官职权力的来源乃是一个以至高无上的王权为中心，以对它的绝对效忠为条件的官僚体制。这是千百年以来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世界和社会秩序。在这个文化世界中，比起官位权力，钱只是一种次等的权力，权力比金钱高贵得多，因为权力能办到金钱办不到的事。

文革期间比任何其它时候都能说明“需要”如何受制于等级地位。需要其实就是“正当需要”，而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身份地位走的。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没有这个需要。“正当需要”证明“待遇”的合理性，待遇体现的就是理应得到满足的正当需要。文革中，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如

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等都是由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文革中的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中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数）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国家以此宣称它满足了所有人的同样需要，因此具有统治合法权威。这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它的控制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性需要。文革中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一切不在国家权力限定范围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稍有流露就会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罪名受到打击。文革的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它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意志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

吃和穿看起来是一些“自然的”基本需要。文革中政治权力对需要的直接干预让我们充分看到了哪怕最自然的需要，也不那么“自然”。就以“不饿死”这个吃的基本需要为例，作为政治组织活动的吃“忆苦饭”就是以低了还有更低的比较在规定“吃”的基本需要。文化世界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在这个具体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要，包括“自然”需要，都是由政治和道德合一的权威所规定的，我们不能脱离这个现实去谈什么自然、普遍的基本需要。文革中，极低限度供应的物品具有“幸福生活”的文化意义，因为“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所吃的食品 and 所穿的衣服不只是在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体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他们之所以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是因为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缘故。

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中，由于“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这和当时政治在其它方面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伊格那提夫（M. Ignatieff）所说，“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文革期间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区别的程度。控制人的这些需要（如一切票证跟着户口走），

成为控制整个社会最得力的工具。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控制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是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仅仅局限于满足于动物性的生存本能。这种需要观极度扭曲了任何一个正派社会所必须重视的人的其它需要，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爱和群体归属感。索勃（K. Soper）指出，需要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判断，我们是用人的需要的合理性去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在一个无法讨论人的需要，或者缺乏这种讨论能力的社会中，人们是很难就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理想有建设性看法的。同样，在一个人们不能进行自由、理性公民参与的社会中，他们也永远没有机会进行关于需要的讨论和培养这种讨论能力。专制权力长期严酷控制需要的后果是社会形成需要共识机能的严重衰退。一旦政治权力强加在物质需要上的禁欲限制得到解除，整个社会立刻无条件地接受金钱的左右，摆向了物质纵欲的另一极端。金钱和欲念于是成为驱动人们物质生活的唯一动力。

“欲念”（desire）和“需要”之间是有区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文革期间，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完全是由意识形态来决定的。你欲念的东西，如美、人际亲密关系、感情和信任关系，甚至稍精致一些的食物、衣物、用品，专制权力都可以武断地将之规定为你并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此成为“奢侈”，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追求”。今天，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个人欲念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纵欲消费成了后文革时代的新时尚。

文革期间和现今中国的物品世界虽然看上去已经判若天渊，但它们都缺乏关于需要的社会共同理性思考。这一点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正如道伊尔（L. Doyal）和高夫（I. Gough）在《论人的需要》中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既不是个人自己最能决定的主观偏好，也不是经济计划或者政党官员所规定的那种基本供应。需要是普遍的，也是可知的。我们关于需要是什么的知识，关于要用什么来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不断变化和需要讨论的。”只有在一个人人们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会在道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欲念的必要，更加要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

会弱者的需要。

三.文革时期有分配正义吗？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悬殊和物质分配不公，富有阶层不断加剧的炫耀性消费和挥霍无度，社会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些都使得许多人形成了关于现今社会和文革社会不同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带有明显的道德价值评断，那就是，文革时期的物质分配比现在公正，至少在这一点上，文革时期有它值得人怀念之处。今天认为文革时期比现今更具分配正义者所着眼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的票证物品分配，也就是一种看上去很公正的同样需要同样满足。文革是否公正，要作出判断，不能仅靠与不公正的现在相比较，而有一个标准问题。与一个不公正制度不同的制度完全有可能也不公正。我们可以用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因此比较普遍运用的分配正义标准来检查一下文革的分配正义，然后再用文革时期自己的制度价值来检验一下它的平等原则，具体地看一看文革分配中的问题。

第一种是以同等“财产权利”为原则的分配标准，或公正标准。按照这个原则，物质分配不以平等的需要，而以每个人对自己需要的理解，优先次序和满足能力为基础。一个人的财产只要来路正当（通过合法的遗产，正当的收入等等），怎么使用都属正当。选择过奢华的还是朴素物质生活，那是他自己的事。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分配正义。它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那就是，人人财产有保证，自己的财产自己支配，旁人不得侵犯，也不得指手划脚，对大家都有好处。每个人的财产虽不平等，但支配财产的权利却是平等的。

按照这一标准来看，文革期间的物质分配显然是非正义的。当时，即使一些在文革之前被承认为正当来源的财产（如工资、定息和房产）也可以被任意剥夺，更不要说各种各样的“抄家”、“降薪”或者甚至“停发工资”了。正当收入得不到保障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劳酬无联系，多劳不多得，高贡献不高收入，这本身就是对通过劳动应得的正当收入，即合法财产的剥夺。当今中国社会的财产拥有程度越来越悬殊，造成了满足需要能力的极大贫富差距。许多人是以前和文革的巨大差异来回顾文革时物质分配平等的。文革时的“平等”其实是建立在正当财产无法律保障的基础上的。从同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当今许多富人财产来源

缺乏正当性，这才应当是批评当今分配制度的关键。

第二种是以“同等人生机会”为原则的分配正义。按照这个原则，公民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必须能满足一些基本需要（衣、食、住、教育、保健等），这是实现每个公民同等人生机会的基本条件。同等人生机会不是指人人工作、收入、社会地位一律平等，因为现实社会的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不平等。正是因为这些不平等，才必然有竞争。同等人生机会是指平等的竞争机会，这包括不剥夺任何人竞争的权利和为那些可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竞争者（社会弱势群体成员）提供更好一些的机会。这一分配原则要求国家发挥一定的作用，如决定基本福利政策和行使平权法案。这一分配原则还坚持，在基本福利需要之外，国家无权干涉社会成员在需要和需要满足问题上的自主权。

从同等人生机会的原则来看，文革时期的分配也是非正义的。当时的人按阶级等级划分成三六九等，在起跑线上已是极不平等。就业和升学这些重大社会机会更是明目张胆以“出身好”为条件来实行“正当”歧视。当时的国家确实以“定量”为行政手段来保证食和衣的极低限度供应，一般人也都享有健保，但都是最低标准的。中小学虽免费，但却并无有质量的教育。人们不满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满当时生活资源的高度匮乏。这是“奔小康”口号在文革后极有号召力的原因。除非出于“大家穷”比“只有我穷”好的心态。即使是现今生活贫苦者，单从满足物质需要而言，恐怕极少有愿意回到文革时代的。当今严重的贫富悬殊限制着贫困者本应与富有者同等的人生机会，这种社会非正义不是靠回到文革的社会非正义可以得到纠正的。

不同意从以上两种分配标准得出文革分配非正义结论的人会说，文革分配本来就不认同和不接受这两种原则，当然不可能与之相符。那么我们现在就用文革分配自己的公正原则来看一看它是否具有它自设的公正标准。

文革分配原则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前提是，所有人的需要和需要结构是一样的。只要给人们以等量的物质，他们的满足程度也是一样的。从这一原则出发，认为文革物品分配比较公正者会说，文革中人们满足程度虽低（物质虽不丰富），但分配却是公正的（获得的满足是平等的）。但实际情况是，平均主义其实并不可能做到它自设的“绝对平均”，因此也就不可能具有它自称的正义性。

平均主义强调同等需要同等满足。什么是“同等满足”呢？同等满足可以指

这两种不同情况：一、同等地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同样需要，二、所有人不管有什么需要，都必须同等地满足（所有的需要满足到同等程度）。显然，文革中的同等满足指的是第一种情况，那是在极有限制的衣、食范围中的同样需要。当时限量的粮票、油票、副食、肉票、布票等从形式上维持了这种“同样需要”。姑且假设当时所有的人都有同等购买这些定量的能力，这样的分配原则本身是不是公正呢？

我们不妨以最理想的情况打一个比方。有一群十个人，其中三个是吸烟的，其余不吸烟。这十个人可以分用的食品和香烟都极有限，怎么去分给他们呢？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对食品都有相同的需要，但对香烟却不是这样。他们把食品分成十份，把香烟分成三份。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些人的需要并不相同，吸烟者有额外的需要。这样看起来很平均的分配其实不平均，因为吸烟者事实上比其他人从共同资源中取得了更多的东西。

还有另外一种平均分配的办法，那就是把食物和香烟都各分为十份。这就会发生以下两种情况。一是有的人有香烟，但与满足需要没有关系（有人不吸烟）。不吸烟者还可能拿烟与吸烟者换食物，因而造成事实上不平均的分配。二是有的吸烟者会用自己的食物去换香烟（不够吸，并认为烟比饭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对食品的同样需要就得不到同等的满足。

以上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同样需要同样满足的平均主义原则。也就是说，绝对平均主义其实并不平等，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平均分配，它并不具备它自己标榜的正义性。

其实这十个人的分配还可以比上述情况更为复杂。这十个人中可能有人有病，需要额外的份额恢复健康。可能有的干活比别人重，所以更需要食物。可能有长身体的孩子，群体有优先保证孩子的道义责任，等等。所有这些实际情况都会使得同样需要同样满足的平均主义原则变得更加不公正。在理想状态下，十个人分两种物品都已如此，何况一个社会分配多种多样的物品？

事实上，文革中的平均主义本身就是以极不平均的人群区别为基础的。例如，城镇居民每人有定量的油、粮、副食品，每户有定量的煤、香烟，而农村人口就没有。当时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的极度贫困和物质匮乏只是在知青下乡后才逐渐为外人所了解。在农民的眼中，当时城里人过的已经是“享福”的生

活。即使在“享福”的城镇家庭之间，又何尝有过真正的平等？就拿子女插队来说，没有政治背景或关系的人家几个孩子下乡插队，有背景、有关系的进工矿、参军或当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插青的口粮来自生产队，不同的生产队一年分粮有多有少，不够的要靠家人从定量中贴补。插青还得孝敬管插青的干部。干部随意到知青家中吃喝，请客吃饭和烟酒皆出自知青家里的定量供应。可见物品的个人或家庭支配量并不是以平等分发多少粮票、布票、香烟票可以衡量的。除了这些物品的其它用品，从洗澡盆到家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也都是凭票供应，票券掌握在有权的人手里，成为他们满足自己额外物品需要的手段。文革中物质分配的许多不公正都被徒具形式的平均“定量供应”所掩盖。把文革时代的物品分配认作平等分配公正原则的体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文革比在任何其它时期都更清楚地显示了消费物品和行为在改变和再生社会秩序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文革时期物质文化和政治、社会秩序特征向一般情况下的消费文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消费研究者讨论得较多的是再生作用，尤其是物品对于维持和巩固现有社会等级类别的作用。这种再生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稳定现状和化解异数。物品从文化世界获得文化意义，将文化世界实体化，并将这个文化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文化渗透在我们使用的物品之中，包括住房、用具、书籍、装饰等等。意识形态和物质世界因此合二为一。当人们自觉自愿地接受了正确的物品和对物品的正确使用概念时，他们也就把物品后面的那个文化世界当作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这是物品稳定和巩固社会现状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品是社会秩序中的一种保守力量。在一般社会中，现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往往能有效地化解由物品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异数。变化异数往往会被保留在原有的秩序中，成为它的一部分。

一般的消费文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般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一般情况下谈物品对于改变现有秩序的作用，是为了避免把消费文化看作是既定社会现实和秩序的直接反映，成为一种现有秩序决定论。但它的理论意图往往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的实例。文革的情况和一般消费文化理论所观察的完全不同，文革物品几乎是一下子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变化之激烈前所未有。文革物品秩序和文化世界在与前时期的暴力决裂（革命，造反）中获得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使得一

般消费理论和社会变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解释能力。就文革与前时期社会秩序的关系而言，并不是物品消费的变化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变化，而恰恰是社会秩序和文化世界的剧变造成了物品文化范畴和价值的突变。如何从这个根本特征去进一步认识文革时期的物质、物品文化，将还有待于消费文化研究去进一步探讨。

【小资料】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4月18日成立)

主任——

李德生，52岁，河南新县人，十二军军长，省军管会主任，贫农出身

副主任——

廖成美，52岁，福建龙岩人，总字124部队司令员，雇工出身

宋佩璋，50岁，河北临城人，十二军副政委，富农出身

李任之，49岁，广东东莞人，原中共安徽省书记处书记，贫农出身

杨效椿，57岁，山西万荣人，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第一书记，富农出身

徐文成，41岁，工人，原合肥钢厂废钢科党支部副书记，贫农出身

张秀英，女，27岁，安徽纺织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张家云，女，23岁，六安寿县戈店公社社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常委——

程业棠，56岁，安徽六安人，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娄学政，53岁，陕西岚皋人，十二军原参谋长，破落地主出身

熊玉坤，50岁，四川北川人，巢湖军分区政委，贫农出身

李康，47岁，山东苍山人，空军蚌埠基地政治部主任，贫农出身

马长炎，56岁，江西乐平人，原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李振东，49岁，河南巩县人，原中共安徽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中农出身

孟家芹，49岁，江苏盱眙人，原安徽省交通厅厅长，佃中农出身

王启腾，34岁，安徽桐城人，合肥汽车公司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共青团员

童保军，34岁，安徽定远人，合肥轴承厂工人，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东林，35岁，安徽宿县人，淮南市东风矿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朱兆连，40岁，安徽淮南人，淮南市大通矿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杨培义，49岁，湖北汉口人，马鞍山桃冲矿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陈广友，38岁，山东峰县人，蚌埠铁路分局火车司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成义，39岁，安徽桐城人，铜陵特区铜官山铜矿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尹良美，45岁，安徽长丰人，合肥长丰县陶湖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农出身，中共党员

龙冬花，女，39岁，安徽贵池人，池州贵池县乌沙公社党支部副书记，下中农出身

周道远，27岁，安徽芜湖人，安徽大学学生，中农出身，共青团员

李胜利，23岁，河南新郑人，合肥工业大学学生，下中农出身，中共预备党员

许燕，女，19岁，河南太康人，合肥实验中学学生，革命干部出身，共青团员

王有香，女，25岁，山东淄博人，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城市贫民出身，中共预备党员

朱兴华，35岁，安徽宿县人，安徽省人民出版社编辑，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说明：军队代表与干部代表均系中共党员，不另注明。

安徽群众组织因对1967年1月26日夺权的意见分歧而分裂为两大派：以“八二七”为主体的G派（即好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P派（即屁派）则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省革委常委中的群众组织代表各属什么组织、哪一派别，不详，望知情者能提供相关信息。

【编读往来】

[逸敏谈钟青谷的来信](#)

看了第 58 期编辑部对美国读者钟青谷质询的答复,非常赞同编辑部的观点。

《记忆》坚守“实事求是，抛开成见，尊重史实”的理念，为不同意见者提供了促进文革研究的交流平台，这在仍然被要求舆论高度一致的当今中国，实属难能可贵！从《记忆》收到的指责可以看出，舆论高度一致的要求不仅来自于当政者，甚至还来自于一些反对当政者控制舆论自由的人的潜意识。中国人几十年间所接受的教育，阶级的概念已深入骨髓，已使不少人（包括那位美国读者，想必他青少年时代也是在中国大陆接受的教育）不自觉地带有以个人之见为标准，顺我者为友，逆我者为敌的思维定式；而凡事要有“鲜明的立场”、“明确的政治倾向”，以言论者的家庭出身、家庭或社会背景对其所述所论划立场、作定论，这些也显然是文革遗风。由此可见，中国对文革的研究和批判，要能真正像德国人做到的那样，既从希特勒也从国民性、对纳粹时期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实在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感谢《记忆》的努力。